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8.1

一年出版3期，以17种语言刊出

访谈 Virginia Fontes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ISA第19屆世界大會 於多倫多

Margaret Abraham
Rima Wilkes
Patrizia Albanese
François Lachapelle
Patrick John Burnett
Mitchell McIvor
Mickey Vallee
Elise Maiolino
Cary Wu

性別與暴力

Maggie Walter
Joselynn Baltra-Ulloa
Jacob Prehn
Kammila Naidoo
Magdalena Grzyb
Sylvia Walby

馬克思和今日的社會

Gáspár Miklós Tamás
Erik Olin Wright
Alexandra Scheele
Stefanie Wöhl
Bob Jessop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Satish Deshpande
Michelle Williams
Raju Das
David Fasenfest

開放論壇

- > 中國的階級不平等
- > 印度的公立與私立大學
- > 介紹變與不變的編輯團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8卷 / 第1期 / 2018.4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若经济学的立场是市场和扩张，政治学的立场是国家和确保政治稳定，则社会学的立场是捍卫公民社会。在这个市场和国家垄断的时代，社会学，特别是公共的面向，必须为人性辩护。

Michael Burawoy, 2004, ASA會長演講

全球社会学的挑战有三个，第一个是形构一个社会的社会学，第二个是建立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学，第三个是开创一个给社会的社会学。为公民社会辩护，这是社会学初衷。

Michael Burawoy, 2014, ISA會長演講

我們從 Michael Burawoy 的两段引言开场。作为新的主编群，我们肯认这个公共与全球社会学的杂志：《全球对话》的重要性（见 7.4 期）。

第一个引言是 Michael 在 ASA 的演讲，关于公共社会学。而第二个则是他担任 ISA 会章的演讲，关于全球社会学。

“迈向公共、迈向全球”是 Michael 如何浓缩其两个演讲的十年的精华。这十年来，这个议题在国际上被热烈的辩论着。此外，十年来在美国教书研究的 Michael 如何批判地看待霸权社会学，于是成立了《全球对话》。一个人不用分享 Michael 的观点就可以知道他如何把这个议题带向国际，开创了一个对话空间，去讨论研究、时事、以及对学科的反思。

當 Michael 问我我们是否要接续他的工作时，我们倍感荣幸，感谢他的信任。我们期待挑战，但也没有草率做出决定。我想作为公共社会学家，我们都要面对 Michael 所描述的这个“市场和国家的寡占的时代”如何威胁着社会。

我們的社會已經歷經了巨大深遠的社會變遷，這是從 1970 年代开始的，这些过程可以被视为是在全球北方和南方以及西方与东方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些包括了 1970 年的新大萧条，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有全球化，以及金砖四国的兴起，2008-09 年的全世界金融危机。此外，还有福利

国家的消解、重构、重组从 1980 年代开始，新社会运动，经济、政治、宗教的战争，被迫的大规模移民，物质的贫脊，社会危机，生态浩劫，社会不平等加剧。我们也看到了“守规则的叛变” (Ardon) 的新右派民粹主义抬头，威权主义的复辟。

這些現象代表了不平等的發展是被高度複雜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因素所形構的，而且有相當不同的結果。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國際、跨國的關係和匯流，像是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組織重構，同時還有民粹主義在美國、歐洲、亞洲、拉美的興起。而階級不平等的興起在 OECD 國家中也很重要。此外還有性別、族群、國族的不平等。

雖然社會學對於這些現象的詮釋是相當異質甚至是矛盾的，有個共識是這些變化影響了學科相當核心的部份。在這個後事實的時代，一個致力於找出事實的社會學是相當重要的。若是一個學科無法和權力宰制脫勾，無法分析反思社會發展，那就註定失敗。所以，不論有多麼不同，社會學家必須發展出一個共同的興趣去幫主建立學院和非學院的公眾之間的對話，並透過這個對話展開行動。作為新的主編，我們希望把社會學觀點從世界各地帶往一個生動的討論方向去，無論是社會發展或是學科發展的議題上都是。

本期將以訪談揭開序幕：訪談拉美的

>>

馬克思思想家、依賴理論的理論家 Virginia Fontes。她邀請我們去反思巴西的理論研究的歷史，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對於 2016 年议会政变的分析的看法。

有超過 5000 名的社会学者将会参加今年在加拿大 Toronto 的 ISA 世界大会，讨论当前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而 ISA 会长 Margaret Abraham 也解釋為什麼大會的主題“權力、暴力、正義：反思、回應、責任”是如此的重要。Patrizia Albanese 是在地籌劃委員會的會長，Rima Wilkes 是加拿大社會學會會長，以及其他加拿大社會學家則有精彩對於加拿大社會學的討論。

暴力和性別通常是個禁忌的話提，而大家也努力把期待到公共領域之中，其揭露的問題也讓人憤慨萬千，Margaret Abraham 邀請了波蘭，英國，澳洲，南非的學者討論了相關的議題。

馬克思的 200 岁冥诞提供了我们去反省其理论和概念如何在今日社会学中被讨论的机会，许多学者已经被我们邀请去分析社会学的历史，并从马克思的理论和批判出发去考察。其文章展现了马克思如何可以作为社会的理论的参照，也可以成为社会发展另类道路的指引，以及马克思如何被女性主义者批判，其理论如何被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还

有国家和法律的发展等等，我们从这些跨国的作者的文章中看到了马克思的世界知名度。

在開放部份，我們有文章討論了市場化對於印度的大學的社會學的影響。我們也有一篇文章關於中國的勞動情況的研究。此外，《全球对话》的新主編群也將會自我介紹。

Michael Burawoy 的慷慨支持以及全球團隊的溫暖歡迎，讓這個交接轉移的過程簡單許多。我們想要謝謝所有的人，並且有信心讓這個全球的合作對話空間繼續大步往前邁進。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新任《全球对话》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請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编: 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编辑顾问: Gustavo Taniguti.

编辑顾问: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in Urtau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Lucas Amaral Oliveira, Benno Warken, Angelo Martins Junior,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ina Bastani, Mitra Daneshvar,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ki Yokota, Yuko Masui, Kota Nakano, Riho Tanaka, Masaki Tokumaru, Marie Yamamoto.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Iwona Bojadźjiewa,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Łukasz Dulniak,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Aleksandra Senn,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Maria-Loredana Arsene, Timea Barabaș, Denisa Dan,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Alina Hoară, Alecsandra Irimie-Ana, Cristiana Lotrea, Anda-Olivia Marin,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ș-Mihai Mușat, Mioara Paraschiv, Codruț Pinzaru, Adriana Sohodoleanu, Elena Tudor.

俄国: Anastasia Daur, Andrei Sinelnikov, Elena Zdravomyslova.

台湾: 何經戀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Virginia Fontes是今日拉美最杰出的马克思思想家，对于从2016年巴西的国会政变以来的政治经济有着深刻的批判。



第19届ISA世界大会于2018年7月于加拿大Toronto举行。在地筹备委员会主席Patrizia Albanese分析了加拿大的社会学。



在马克思的200岁冥诞，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讨论了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包括了国家、法律、种族、女性主义。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赞助。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 談論社會學

论资本帝国主义：访谈Virginia Fontes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巴西 6

> ISA第19屆世界大會

權力、暴力、正義
Margaret Abraham, 美國 10

加拿大社會學和世界大會
Rima Wilkes, 加拿大 12

一個讓社會學團結於加拿大的機會
Patrizia Albanese, 加拿大 14

加拿大的大學：在地性和全球性
François Lachapelle, Patrick John Burnett,
加拿大 16

学生贷款对于加拿大大学毕业生的影响
Mitchell McIvor, 加拿大 17

成为公民科学家
Mickey Vallee, 加拿大 18

加拿大的認同工作和政治領導
Elise Maiolino, 加拿大 20

移民在高信任的加拿大有被信任嗎？
Cary Wu, 加拿大 21

> 性別和暴力

交织性、本土性、性别、暴力
Maggie Walter, Joselynn Baltra-Ulloa,
Jacob Prehn, 澳洲 23

南非的性暴力和“矫正性强暴”
Kammila Naidoo, 南非 25

让波兰的家暴被看见
Magdalena Grzyb, 波蘭 27

邁向零暴力？
Sylvia Walby, 英國 29

> 马克思和社会学

馬克思200年冥誕 31

马克思和社会学，2018
G.M. Tamás, 匈牙利 32

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传统愈益相关
Erik Olin Wright,
美國 34

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Alexandra Scheele, 德國, Stefanie Wöhl,
奧地利 36

馬克思和國家
Bob Jessop, 英國 38

資本主義的Landnahme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巴西 40

印度的馬克思和社會學
Satish Deshpande, 印度 42

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44

馬克思和全球南方
Raju Das, 加拿大, David Fasenfest, 美國 46

> 開放論壇

中国的阶级不平等和社会斗争
Jenny Chan, 香港 48

印度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比较
Niharika Jaiswal,
印度 50

介紹變與不變的編輯團隊 52

“在了这个了国家历史困难的阶段，我们社会学家不可以对冲突抱持冷漠，否则我们将变得跟社会毫不相干”

Margaret Abraham

> 论资本帝国主义

访谈 Virgínia Fontes



Virginia Fontes.

Virgínia Fontes 是今日拉美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是 Fluminense Federal 大学 (UFF) 的社会史教授，也是巴西 Rio de Janeiro 的 Oswaldo Cruz 基金会 (Fiocruz) 的资深研究员。她于 2005 年出版的《Reflexões im-pertinentes: História e capitalismo contemporâneo》一书中检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商品画得新型式，结合了理论反思和经验分析。以剥削的概念为基础，其研究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批判。2010 年出版备受瞩目的《O Brasil e o capital-imperialismo. Teoria e história》一书代表着其反思的高峰。透过和马克思依赖理论大师 Ruy Mauro Marini 的批判性对话，她提出了一个帝国的新理论，可以把 1960 年代发展起来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带领到新的境界。这篇访谈由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完成，是 Rio de Janeiro State 大学 (UERJ) 的法律社会学教授。

GLG：知识的生产 and 传播中，依赖理论典范地克服了知识的从属性，这个从属性盘据在拉美上空很久了。全球上，这已经传播到了许多的领域，而有可能透过依赖里伦去描述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来解释这个现象吗？

VF：理论上我们很努力地去区分依赖的马克思主义 (MTD) 和采取适应资本主义的取径。W.W. Rostow 的书《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1960) 变成了国际制度的圣经，强加了许多步骤在“未发展”国家上，要

>>

他們要“自己發展起來”，許多的分析也證明了是錯的。聯合國的組織，像是ECLAC / CEPAL等，都顯示了資本主義的擴張讓後進國家的發展受阻，這是因為“不平等交換”讓那些國家的財富被榨乾，阻礙了工業化。而其他人士則認為發展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發生在邊陲國家。儘管這樣的批評聲浪，該理論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內展開的。

MTD則超越了這些取徑。分析資本主義的擴張作為不平等的惡化，MTD理論處理了本主義關係的整體，透過價值理論，也就是資本主義擴張在邊陲國家的一個具體形式，去分析資本主義。其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理論和實踐跳躍，並不斷強調要去克服資本主義自身，而是不僅僅克服未發展和依賴的各種形式。

GLG: 在你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對於Ruy Mauro Marini的理論的批判性承認。其對於邊陲資本主義的理論是說，拉美布爾喬亞階級的依賴會邁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去形式化，這是以對於勞動的超級剝削所造成了價值定律的克制性功能為基礎的。就是說，藉由轉換工人消費的必要資金到資本積累的基金中，邊陲的布爾喬亞會試圖去保持自己一部分的剩餘價值並把一部分交給資本主義核心。這個理論的困難之處在於？

VF: Marini是個很基礎的思考者，他對於這個主體有著雙重的觀點。對他來說，邊陲國家扮演的角色不是固定被追蹤的，也就是有許多變數是連結到帝國主義，地方的資本積累，社會鬥爭，國家，等等。他的分析忽略了固定且嚴格的国家階層，並且有著化約主義，這讓他可以去掌握巴西的次帝國主義在國際資本一中的脈絡。此外，他也發展出了一個結構的取徑去看價值定律如何在帝國主義中展開：超級剝削勞工在邊陲國家的發生以及生產與消費的循環的分裂如何解釋了價值被轉移到資本主義中心的过程。這些都是他所謂由於帝國主義和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矛盾所在，也是介於國家特質和帝國緊張之間的。

這些大的宣稱必須要有不斷的再詮釋，因為這些主張同時處理了資本主義關係的擴張和不均衡的依賴再建立的過程。他們讓我們去推論依賴性並不產生固定的關係，不在家之間，也不在資本主義類的次循環之內。反之，其代表了矛盾的僅彰化，而

我也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擴張如何在巴西展開，這特別在農民的的播削之後。隨著農民的減少，價值定律擴張的潛力也增強了，而不是被壓下了，這是因為社會歷史對於勞動力再生產的需求。透過這個鬥爭，工人得到到了一些改善，但是要面對接下來資本主義的再度剝削。這個二度剝削也影響了核心國家，也就是為什麼Marini的超級剝削的論點必須被不斷地檢視。

這在生產和消費的分裂這點上也有所改變。在1960年代，巴西工業生產奢侈品，主要是給社會中一小群的人。可是從1970年開始，消費信用擴張到了這些奢侈品，改變了生產和消費的差距，但惡化了不平等。Marini聲稱巴西的次帝國主義是被商品的出口左定義的，起因於工人階級的被播削和消費不足，也被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所影響。這個意義上，我指出，從1990年代開始，巴西公司移到其他邊陲國家並成立巴西跨國公司去出口資本和剝削工人與自然資源是這個次帝國主義的證據。但我不把Marini的作品看成是一個去形式的資本主義於邊陲國家中的假設，因為這個想法隱含者先前的階段會發展到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但這是錯誤的假設。

GLG: Marini的次資本主義概念和你的資本帝國主義有什麼差別？為什麼提出資本帝國主義？

VF: 幾十年下來區分了我们之間的分析。Marini強調價值轉換的結構過程，我則把人類社會生產給勞動（奪取）連結到財產國際化的集中的特定形式，新的價值榨取形式，還有國家政治的重新設計（Gramsci出發），這樣的社會矛盾的惡化是響應到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甚至是取代到資本帝國主義內的緊張。

我稱資本帝國主義擴張是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集中和競爭的資本聯合起來行動。內部的資本宰制需要外部的市場、出口、土地的奪取、權利的奪取、環境、生態、人口等的奪取。對於資本來說基礎的社會關係是通則化的，並以反對共產主義為基礎。新的布爾喬亞派系和邊陲國家被強化了，但是政治的多元性減少了，變成名目上的民主。資本的集中讓邊陲國家導致了“純粹資產”的宰制，越來越“抽象”和“社會”。少數的大資本家價值化了資本，推動“功能資本家”到最多樣甚至暴力的

>>

價值榨取形式中。生產的社會資源的私有財產（收集勞動力生產和價值榨取的能力）變成了絕對。許多奪取變得強烈，強加了新的不好的勞動形式，並透過每一個人類活動的工業化和勞工競爭的惡化去達成。

我試著去避免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危機的字眼。新自由主義不是“文明化的”資本主義的墮落，因為其源自於資本帝國主義，不是危機。我們生活在巨大的擴張之中，危機影響了多數的工人，不用透過碰觸到“純粹”財產。而資本的地理擴張也關聯到了矛盾的工人政治膠囊化國族疆界之中，人性的很大一部分整了生產和傳播的過程，更新了不平等的形式。代議民主傳播開來了，但是民主價值被化約成財富為主的精英統治。政治行動變成極化，資本國際化，勞工分裂化，布爾喬亞也開始行動，透過官方組織（聯合國，WTO，IMF），非正式政治（非營利的傳播），正式的政治。而過專家和憲法，布爾喬亞試圖防止資本主義被取代。而資本官僚也宰制了國家，把民主簡化了。資本帝國主義的擴張，而非危機。導致了新的國家和國際的緊張，在社會階級和資本地國家家之間展開。

GLG: 在資本帝國主義這個概念的核心是一個關於奪取的討論，這指向了馬克思主義對於原始積累的反省。這個辯論有很長的历史，追溯到 Rosa Luxemburg。你怎麼進入連結到這個傳統？奪取意謂著什麼？和剩餘價值的榨取關係為何？

VF: 馬克思堅稱奪取整合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動態。這不是只有“之前的時刻”而已，自由工人的存在組成了社會關係擴張的社會基礎，把資本和勞動鑲嵌近來，然後進價值剝削。今天，大量的錯置在人口中蔓延，強制的勞動力販賣發生在各種情況下。大規模的奪取是資本主義擴張結果的起始社會情境。

直到近期，世界上大量的人口還住在鄉村，是前資本主義的情境。鄉村世界成為了面對都市資本主義的有效的例外，但這改變了。Rosa Luxemburg 深信資本的擴張需要非資本的前線，因為重商主義的不可能成功性。David Harvey 修正了這個公式，認為今日的資本主義生產了外部性（“持有”描述了“正常”資本主義的展開）。我不同意，我不認為有所謂正常的資本主義，而國家也有野蠻的帝國主義價值榨取。這些雖然是假設，但是我們須堅稱，基本的

社會關係，內部之於資本，是必要品的生產，而第一個就是社會存在的生產，這提供了其自己在市場中的存在。Rosa Luxemburg 提醒了我們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持續擴張是多巨大。

GLG: 在什麼樣的程度上，奪取這個概念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分析是基礎的？

VF: 已經不可能去忽略奪取這個概念了。當老的土地奪取仍然在鄉村地區發生，新的奪取已經席捲了都市人口了。我稱後者為次級奪取，其不代表財產的損失，或是生產工具的失去，次級奪取以兩種方式進行，首先，1) 類似於英國議會在 16 和 17 世紀的奪取一樣，是對於權利的取消，包括了勞動權利，壓制其合約，公共財產的私有化，以及公部門的私有化，像是教育和健康。再者，2) 對於自然資源的奪取，像是水和森林，這以往是屬於社會的，數十年前簡直無法想象這種奪取。的確，生活狀況的省產被生物和人類生活以及基因改良種子所壟斷了。

而顯示在生產的社會資源的集中和奪取之間的相關性，這強調了資本主義如何不可能在沒有勞動和價值榨取的前提下存在。其以多種形式出現，從最野蠻的到最“創新”的，增加國際的競爭，並加諸在工人身上，剝奪其面對的手段。要說“金融化”是不夠的，因為這好像有好的（生產的）和壞的（金融的）資本一樣，但實際上是一起的，在經濟中是如此，在對於工人的榨取中也是。

GLG: 你怎麼解釋 2016 年的議會政變？

VF: 巴西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盛行的社會關係（大量的主要和次要剝削，資本集中，各種價值榨取），以及工業化進程中直接連結到的資本帝國主義擴張。巴西布爾喬亞在資本帝國主義擴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從中獲利，特別是私有化和 Cardoso 的政府 (PSDB) 政策。繼任的政府由工黨 (PT) 掌權，也奪走了權利，但是比較隱晦。這些年來，巴西布爾喬亞的分裂導致了官方和超官方的政治行動，透過競選資金得可能。也透過非營利組織，他們試著去吸收工人階級，將其中立化，資源稀有化，和罪行化。

2016 年的政變是被經濟危機所激起的，該危機起始於 2013-14 年并把所有的結構

>>

安排打乱。贪污盛行，让资产阶级自己分裂。一些公司变成跨国页，让紧张情势恶化。其在地的安排被外国竞争者索取代，而司法的迫害显示了内在和外在的再结构是需要的。这些宰制阶级的联合是以对工人的暴力剥削为基础的。

最近巴西在資本帝國主義下的民主預設了對於人口的安撫也確保了對於巴西資本國際化的支持。這就是一個支持資本主義的左翼黨 (PT) 被承認來去確保這個過程。可是這個增加了選舉競爭和成本。巴西的群體有來自其極右派美國的支持，資助了反共的選戰，妖魔化了 PT，並且要打壓一切的左翼。其對於電視的壟斷強加了一種單邊的 diktat，被警察和軍隊的暴力所鎮壓，這些所有都發生在布爾喬亞制度的規範下，也就是其權力分立的架構下。我們看到了資本利益的憲法化，確保了播削，包括了資本家（本土或非本土）的公債收入，憲法是為資本家利益而存在的（巴西和国外）。■

来信寄给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uerjbr>

Virginia Fontes <virginia.fontes@gmail.com>

> 權力、暴力、正義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国, ISA會長, 第19屆世界大會主席



多倫多都市會議中心是第19屆ISA世界大會的場地，7月15-21日，2018。

很難去想象我們有幾個月就要在加拿大多倫多迎接ISA第19屆世界大會了。從這個學科一開始，社會學就關注權力、暴力、正義。現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挑戰讓這些議題更加相關。我們身處的時代需要我們去重新關注這些議題。這次大會的主題“權力、暴力、正義：反思、回應、責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給社會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去進行對話、辯論、思考除何面對這些議題及其影響。

大約1,200個會議場次將會進行，有10,000篇論文摘要。我們預計會有超過5,000

名參加者來自世界各地於7月15-21日到加拿大多倫多來。他們將會分享知識、交換意見、提供觀點。第19屆世界大會的主題圍繞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權力的主題，是個結合和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而主題的光譜也包括了我們面臨的挑戰以及我們要面對暴力和正義議題的決心。

> 社會學與社會的核心關懷

我們知道社會學的核心關懷是批判地研究

>>

社会行为和制度，然而，我们对于为什么社会事物是这样子的理解还不够。我们需要去运用社会学知识去把世界改变得更好。在这个追求之下，我们必须去处理影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议题，和公众互动。这必然隐含了动员社会学去研究权力和掌权者，去研究和批判殖民历史和当代土地的掠夺，去反思结构和文化如何让施加于原住民的暴力得以持续，去研究战争的暴力、贫穷、种族主义、性别、交织的暴力、被迫的迁徙等，目的是开创一个更加正义的世界。在这个脉络下，“权力”、“暴力”、“正义”就是重要的概念，涵盖了今日许多的议题，是一个绝佳的世界大会的主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暴力、战争、冲突、憎恨的时代，现有的制度都岌岌可危，民主制度也遭到挑战。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被视为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排外主义的工具，并且滥用权力去迫害弱势群体。这些霸权的寡头利用暴力对付弱小的民族，去维持世界秩序。平等主义的理想被转变成服务掌权者的工具，打着“促进民主”的旗帜去压迫人民。“反恐战争”被用来作为一个箝制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手段，这对于自由、正义、民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暴力、憎恨、愤怒的核心是不平等和不正义，被新自由主义所驱使，只注重市场和获利。国家权力被例行化地使用来保护权力精英的霸权，维持现状。国家的宰制或是市场的权力都没法开创更好的世界。而在这个暴力、动乱的世界，我们社会学家的责任逝去研究和质问主宰的制度、信念、意识形态、实践，因为它们让不平等和不正义恶化。

在这个渺茫的希望中，我们还看到一线曙光，那就是非暴力运动，人道主义介入，和平进程等，这让小区培力起来，减少暴力，促进正义。抗议运动对抗集权，对抗特权，环境伤害，失业，以及其他不正义。然而，反抗消失，运动无以为继，无法确保改变，那权力精英不可避免地会复辟，回到现状，伴随着压迫。这个公民的抗议轨迹提醒了我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是没有终点的，通常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藉由对于共善的关注和讨论，世界大会代表了公民社会。

大会的主题是一个象征性的宣示，认为在这个困难的历史阶段，社会学家无法变得冷漠，不去关心冲突和对抗，否则我们会变和公民社会脱节。这意谓着我们要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社会学，去处理这个世界最复杂棘手的问题。这次世界最复杂棘手的问题。理。社会学界最复杂棘手的问题。理。交织的大会学界最

复杂棘手的问题。理。交织的暴的集会，包括社会科学、记者、运动者，都不能忽视影响了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力量。暴力和正义的议题包括了不平等、种族中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人权等都是我们讨论的核心。

社会学家整合了其他学科的洞见，因此可以有很具有意义的重要贡献给那些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权力、暴力、正义”是跨学科，像是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等里面都很重要的，它们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也是我们为正义奋斗道路上的打拼伙伴。在这个集体为社会变迁共同努力的第19届世界大会中，社会学将提供一个平台给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界的与会者去分享其观点。我期待在多伦多见到你！我相信我们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复杂社会、经济、政治挑战的认识，对找到面对伤害平等与正义的暴力问题的解决之道。■

來信寄給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加拿大社會學和 世界大會



Rima Wilk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社會學會會長, ISA世界大计划副会长, 逻辑与方法研究委员会委员(RC33), 第19屆世界大會在地籌備委員會委員

加拿大社会学家和社会学会 (<http://www.csa-scs.ca/>) 的成员对于第19屆世界大會非常興奮。大會會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多倫多市舉辦, 為期從7月15日到21日。大家會在位於Anishinabek國和Haudenosaunee邦聯的Wendat土地上開會, 這包括了Dish With One Spoon Wampum Belt Covenant, 這是一個合約, 目的適合平分享和保護Great Lakes地区和New Credit First國的Mississaugas土地。

当对土地的承认越来越常见于加拿大, 那就有必要解释。这种承认来自于长期的原主民运动和最近加拿大原住民居住学校真相和协调委员会的2008到2015的注意。虽然承认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伤害不是万灵丹, 但是这对于本次大会的主题: 权力、暴力、正义—反思、回应、责任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在加拿大的脉络下, 承认有时用来去表达珍惜和感恩以及

加拿大的社会学学家期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见面。

对于人和土地历史的认识。承认也是一个政治实践，提供一个提醒一个政治，特别是对那些非原住民的人来说，是关于殖民主义，关于条约责任，关于加拿大对于保护原住民的失败。

ISA 世界大会将会提供绝佳的机会给学者去倾听、学习、对话，讨论重要的议题，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位学者参与盛会。有些人会是第一次参加，有些人是老朋友了，而参与大会把我们大家齐聚一堂。

大会以提供加拿大社会学家机会去和世界交流。加拿大的社会学家非常致力于理论化方法的多元典范。加拿大社会学家就像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一样，对于变迁和多元的经验实在保持开放。加拿大社会学会的 1,000 名会员有 28 个研究群组，从应用社会学、社会理论、关系社会学、科技社会学、到知识社会学。有些最强的学者发表在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这是加拿大社會學的指標期刊。

透过阅读期刊和在 ISA 大会上与学者见面，你将会发现到加拿大社会学家深深地关心社会正义，贡献给务实的政策制定，并且扮演公共社会学家的角色。不过还有很多地放要努力。世界大会会是一个给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一起探索我们对于权力、暴力、正义的经验之响应的同与异。我们非常期待这个夏天的到来！■

來信寄給 Rima Wilkes <wilkesr@mail.ubc.ca>

> 讓社會學團結於加拿大的機會

Patrizia Albanese, Ryerson University, 加拿大, 第19屆世界大會在地籌備委員會主席



2017年7月1日，加拿大慶祝了150周年。這一整年，加拿大人被鼓勵去擁抱加拿大的許多測量出的優點：國內生產毛額，識字率，女性勞動參與，就學率等，這些都被認為是加拿大在全球勝出的地方。雖然有很多值得慶祝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批判的。

> 加拿大的矛盾

沒人會否定我們加总的測量和全球地位。當然，除非你是加拿大的新移民，或是殘障者，原住民，單親媽媽，種族弱勢，住在加拿大的北邊，或是一位要兼差好幾份工作才能養活全家的人。若是這樣，歧視，危險，貧窮，韌性非常可能是生活中要面對的。

這五個面向代表了這期《全球對話》的作者所討論主題。例如，Wu 指出加拿大是個“高信任”的社會，但是 McIvor 提醒我們了不平等和高學貸的事實。Maiolino 指出我們選出了年輕的進步派杜魯多，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少數族裔女性候選人鄒至蕙在最族群多元的城市多倫多還是要協商和動員認同才可以和其白人男性對手抗衡。我們也一直試圖區別我們和美

國，但是 Lachapelle 和 Burnett 所指出的，我們的大學還是跟美國的學術看齊。Vallee 的研究則提醒了我們加拿大的自然美，但是也注意到了物種的瀕臨絕種和環境議題。

加拿大有優點，但是有許多人的生活得面對不平等。加拿大社會學雖然不是沒有缺點，但是通常試圖去點出這些不平等。這也沒有被前總理 Stephen Harper 所忽視（保守派）。

> 在加拿大與全球為社會學做出承諾

在2013年，為了響應一起發生在通勤列車上的恐怖攻擊，加拿大總理 Stephen Harper 認為不是時候去“承諾於社會學”。相似地，在2017年秋天，美國的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被認為和整個社會學有仇，因為他在反對一個論證的時候說那是“社會學式的無意義廢話”。這樣的說法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社會學家通常挑戰權威，特別是在面對權力、暴力、不正義的議題的時候。

所以，響應 Harper 的“現在不是時候去對社會學做出承諾”，我們尊敬地不同意。在這個動蕩的社會政治氛圍和環境不確定下，承諾於社會學正是時候。ISA 和加拿大社會學

会 (CSA) 相信我们都准备好在全球的层次上去努力, 所以我们欢迎上千位的社会学家到多伦多。

第 19 屆世界大會的主题是权力、暴力、正义—反思、响应、责任, 这是由会长 Margaret Abraham 博士所构思出的启发性主题, 这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去提出和面对这个不确定年代的行动方案。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学者交流研究、理论、政策建言、社会行动。

› 加拿大社會學於第 19 屆世界大會

ISA 第 19 屆世界大會也提供了加拿大社会学家—独特的机会去共同举办和展现加拿大的学术与合作。除了有数百位加拿大社会学将参与盛会之外, ISA 也提供了 CSA 四个重要的加拿大主题场次。这些会议场次是加拿大透过竞争遴选出优秀的提案而成的, 遴选的重点是切时性和相关性, 讲者对加拿大议题的研究广度, 以及主题的社会和历史价值。超过 20 位的加拿大社会学家将让大家一睹加拿大社会学得风采。欢迎大家参加这些主题场次:

- 社会学交了我们什么关于小孩和青少年的难民的社会融入?
- 国家如何形塑了社会运动?
- 加拿大社会学于不确定的年代: 反思过去、面对未来。
- 失踪和被杀害的原住民女性: 社会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泛加拿大在地场次筹备委员包括了: Sherry Fox, CSA 管理者; Jim Conley 博士, Trent University; Evie Tastsoglou 博士, Saint Mary's University; Margaret Bancercz 博士候选人, Ryerson University; Mark Stoddart 博士, Memorial University; Simon Langlois 博士, Université Laval; Susan McDaniel 博士,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Rima Wilkes 博士, Univer-

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Myrna Dawson 博士, University of Guelph。我们相信去强调权力、暴力、不正义是很重要的, 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原住民集体动员斗争的议题。我们透过加拿大原住民艺术家 Lydia Prince 创作的世界大会图案, 想要去表达这样的关怀。世界大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给加拿大社会学去讨论和解共生, 塑造更好得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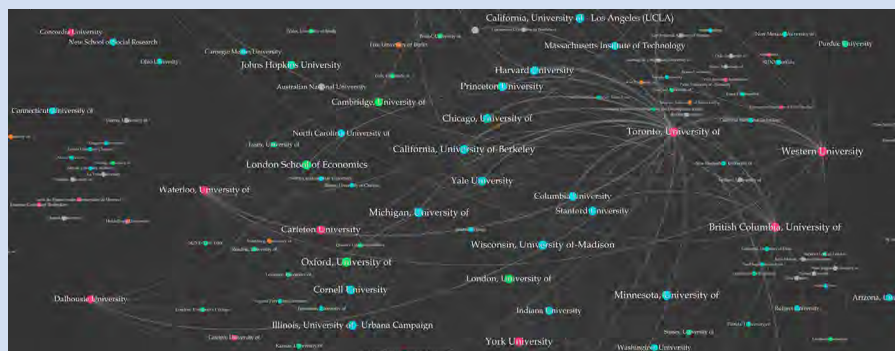
第 19 屆世界大會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其聚一堂, 分享观点和回应关于去培力、暴力、不正义的议题, 以及如何培力社群、减少暴力、促进正义。这是时候去辩论、集思广益、集结、规划我们建立正义社会的时刻。这也是去庆祝社会学家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刻。加入我们! 我殷切希望在 7 月于多伦多见到你! ■

來信寄給 Patrizia Albanese <palbanes@soc.ryerson.ca>

> 加拿大的大學

在地性和全球性

François Lachapelle和Patrick John Burnet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博士交换的网络。详见：<http://www.relational-academia.ca/canadanetwork.html>
Relational-Academia绘图。

最近几年，全球大学排名让加拿大的大学国际声望获得很高评价，顶尖大学骄傲地宣布要招聘最好的师资。而在最近美国和英国的政治不稳定中，加拿大的大学已经准备好要去接收那些因川普和脱欧而出走的人才，并进一步去提高国际声望。

关系学术计划 (www.relational-academia.ca) 研究了加拿大 1960 年代晚期和今天对于何谓“好”大学的意义。在 1960 晚期到 1990 中期，这个时代出现了民族主义和美国于加拿大的宰制，而“好”大学被认为是去聘用加拿大师资和教导加拿大相关的内容，为的是公民的经济、道德、市民的利益（如加拿大化运动）。反之，过去 20 多年来，“好”大学的任务变了，现在是增加国际活动，不论学生、人员、教师、校友都是，然后增加国际名声。为了描述这个从本土到全球的转变，我们收集了 4,934 社會科學者的教育資歷，他們都在加拿大的前 15 大研究型大学任教 (U15)，时间是 1977 到 2017 年。

研究这些教师的国籍背景后发现，加拿大本土训练的博士在中层和下层学校任教的比例明显增加，然而，像是 University of Toronto, McGill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仍然有高比例的美國博士 (70% 以上)。在 1997 和 2017 年之间，三个英语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占了 90% 的博士，而全球南方的博士，主要是南非 (6 个) 和印度 (4 个)，则只有总共 19 个博士在 U15 学校。

除了全球北方的大学政治经济变迁，其也奋力去增加国际学生数量，那我们可以只谈加拿大的国际师资吗？师资第一个学位的取得国

家显示了过去二十年来，上层大学学者在英语系国家之外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数成长了一倍，从 9% 到 18%。2017 年，这些来自 34 个全球南方国家的师资的一半是在美国的大学取得学历。

在加拿大的高等学术中，国际化可以示意谓着两件事情：不是美国化，就是美国中介后的国际化。我们的研究强调了美国的中央角色在这个不对称知识生产的环境，以及学生和学者在国际上的流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脉络来说，这显示了加拿大被宰制的宰制也贡献给了英语的学术霸权。这个科学学的全球场域也从属于美国的科学资本的宰制。■

來信寄給 François Lachapelle <f.lachapelle@alumni.ubc.ca>
和 Patrick John Burnett <pjb@sociologix.ca>

> 学生贷款对于加拿大大学毕业生的影响

Mitchell McIv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Quinn Dombrowski摄影2017, <https://www.flickr.com/photos/quinnan-ya/37230366906>
CC BY-SA 2.0

在许多国家，高中教育已经变成劳动市场的荣景，而高等教育被认为是阶级流动的平等化机制。虽然高等教育对于劳动市场繁荣也很重要，但是学费的指数性涨价让学生贷款喘不过气来。这个趋势已经被研究很多了，但是研究者在解释学生债务对于毕业生的影响来说却是慢半拍。有个问题特别需要被回答：学生贷款如何影响了毕业生的劳动就业市场？我使用加拿大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关于2010年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三年的情况去分析这个问题，看看影响是否会被学生的社经背景所中介，这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的主轴。

比起第二代，第一代的大学生有金融、社会、文化资本上的劣势。他们有比较少的社会网络链接可以去找到相关的工作，比较不知道怎么打造履历和在大学中生存，也比较没有家庭的经济支持。我使用了尖端先进的统计回归技术后，发现了学生贷款债务的很高程度是和第一代毕业生所说的无法等到他们想要的工作、目前工作不是真正想要的、以及必须搬到都市或乡村去找工作等情况是相关的。此外，和第二代的学生相比之下，负债的第一代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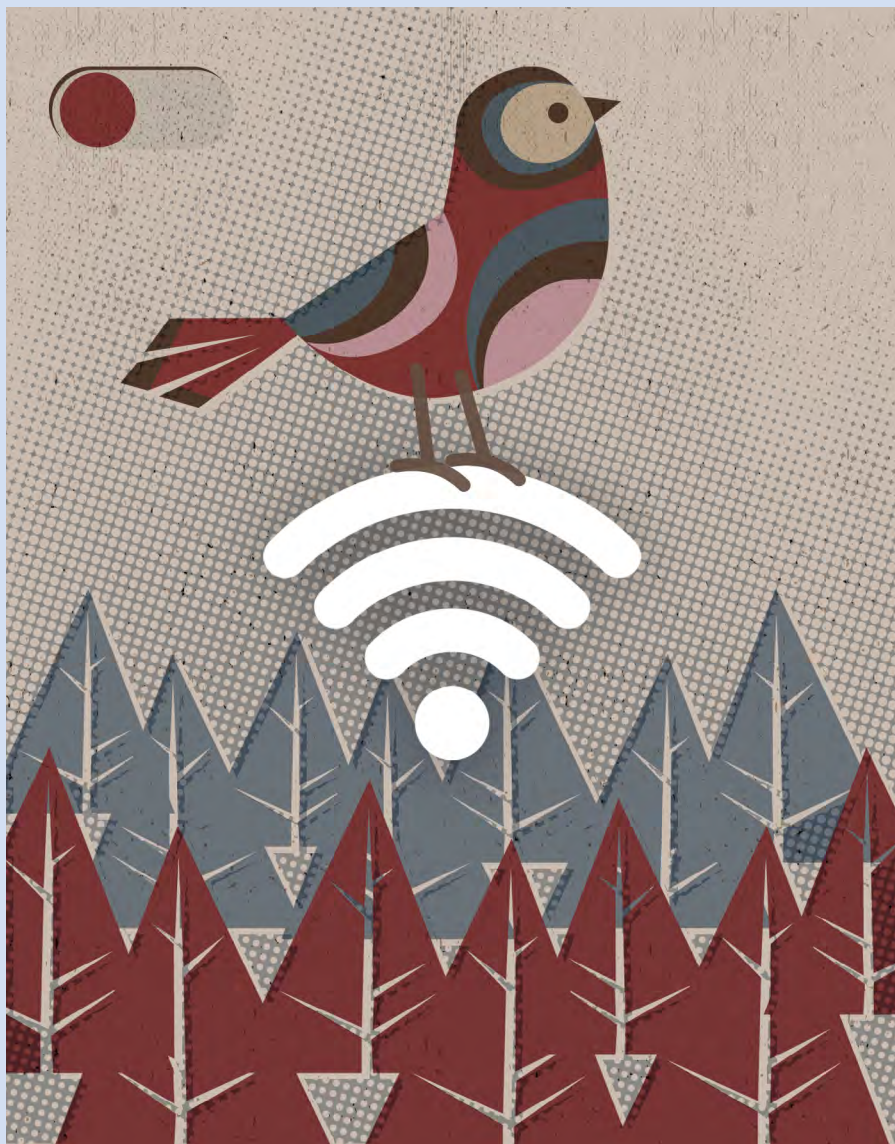
生有比较高的机率会有暂时的工作身份，比较会在毕业三年内换很多工作，也比较没有工作福利，收入教低。不意外第，在劳动市场上比较不好找工作和经历比较多风险，我也发现了负债的第一代学生有比较低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比较不可能认为若再来一次还会想要读大学。这些发现对于当代高等教育作为阶级平等机制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启示。

这些发现指出了当学生贷款债务是被用来提供学费的话，这只会让不平等恶化，让平等机制被抵销。学生债务开启了找工作者的无奈，特别是第一代学生，并且这个工作的不稳定也让工作质量和收入减少。研究结果指出的负债第一代学生认为不会想念大学的看法特别值得令人警惕。总之，这个研究提供了政府把学贷看成是当作就学机会的这样观点转移到提供奖学金和减少学费的政策上。■

來信寄給 Mitchell McIvor
<mitchell.mcivor@mail.utoronto.ca>

> 成为公民科学家

Mickey Vallee, Athabasca University, 加拿大



| Arbu绘图。

18

当我写作遭遇瓶颈时，我会去健行。我住在加大的偏远地区，到小溪、小河、山、野外只需要走路就到了。我喜欢听鸟鸣，红翅黑鸟，夜鹰，乌鸦，黄莺等在树林间叫鸭叫的，相当悦耳，虽然看不到。我为了录下这些鸟的小夜曲，我下载了一款 iPhone 的程序：Song Sleuth，可以录下并且辨认鸟叫。这是由在麻州 Boston 的野生动物声音学会 (Wildlife Acoustics) 所开发的。使用了它，我可以纪录鸟叫，辨认，并且寄给朋友（包括 GPS 坐标）。这把我的个人经验连结到了野生动物声音研究者的全球网络，也链接到了业余爱好者，像是我。

该程序使用生物声音科技，是一个有效侦测的工具让人知道什么样的物种需要受到

>>

包护。追踪鸟叫声让全球的研究者可以得到一个危险物种、迁徙、求偶的“大图案”。因此，仅仅是听、站着、纪录周围的声音就可以对专业的科学研究产生长远的重要影响。

学术和专业的生物声音研究团队包括了许多资金赞助的研究，其收集分析资料，传播研究发现。然而，公民科学家把闲暇时的资料上传现在可说是全球上研究团队的扩展的重要一环。研究团队使用了这种公民科学数据的包括了Cornell大学的Macaulay图书馆，其认为这样得到的数据比起以往的方式都还要迅速得多。

不论科学的贡献为何，公民科学家也经历了重要的健康益处：其户外踏青之外，还看到、听到、纪录到了生物，其生存是越来越受到威胁的。特别是小孩或是有很多和自然接触的经验，长大会更活跃。公

民科学因此贡献给了一种好的生活型态。

除了好的健康，有些研究者赞美公民科学可以让人们更知道环境的议题。其他研究者认为虽然公民科学的结果之一是对环境的认识，但是吊诡的是这很难去测量。各种研究已经证实了声音为基础的方法，像是动物声音学，是和空间的有意义的认识有关的。因此，包括公民科学家在内的动物声音学研究是务实和省钱的方式，好让全球和地方的人们可以对空间（环境）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健行的时候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了吗？我们知道我们的智能型手机可以做什么和分享什么吗？或是，在我们懒惰的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不情愿去预设这样的责任？这只是许多社会学想象的诸多可能性其中之一，对于寻找机会去改变，在传记、历

史、社会结构、科技的交织中发生改变。■

來信寄給 Mickey Vallee
<mjvallee@gmail.com>

> 加拿大的認同工作和政治領導

Elise Maiolino,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过去5年的政治气候已经变成非常好的去研究认同政治和新候选人的一段期间。这段期间，三个最受到瞩目的加拿大候选人分别竞选最瞩目的职位，也都需要在竞选时用出复杂的公共认同的协商方式。虽然许多这些动态对社会学来说很熟悉，但是范围和大小对于加拿大或其他社会来说可以有新的洞见和启发。

贾斯丁杜鲁多成为首相的路上参加了无数次的选举，在成为加拿大自由党的党魁前几个月，他才和保守党的参议员在拳击赛中较量。其男子气概受到检验，透过分析了222篇报纸报导这个赛事，我认为杜鲁多从不确定的男子汉转型成够格的男子汉，这让他的领导被信服。杜鲁多的个案也产生了恢复性别策略的概念，也解释了政治领袖如何在公共场域恢复其性别认同。

杜鲁多的个案之后一年，凯斯琳韦恩问其安大略湖区的选民是否准备好选出一位同志省长。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同志安大略省省长。以其政府和社运在LGBTQ社群中的访问为基础，我发现了即使在这种突破型的政治人物上，其认同并不保证草根的支持。相反的，社会运动强调了政治人物去制定政策的能力。我提出了一种字词和信念的分类去论证社会运动者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是奠定在认同、言说行动、信念上的。

同时，韦恩省长也突破了玻璃天花板。邹至蕙是一位有经验的进步派政治人物，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市长选战中意外失败了。她辞去国

会议员参选 Toronto 市长，挑战在位的罗伯福特，是一位保守派且阻碍很多，像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20场的市长辩论为资料，我发现认同在选举时的挑战是很大的，邹至蕙作为少数族群，其所需要协商和动员的方式和白人男性对手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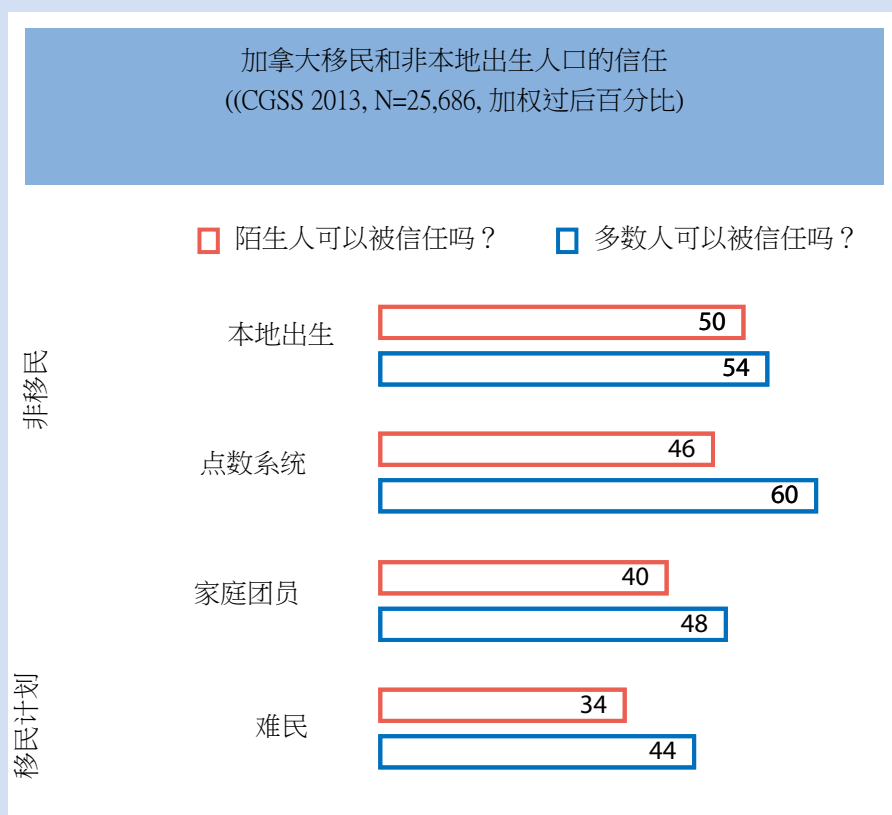
多元型态候选人的浮现和对于多元认同的政治与公共意识的成长产生了性别展演的多元性，影响治理与选举。我的研究希望可以指出那些竞选人面临的阻碍，但也希望提供一个初始的蓝图给相关的行动者去把阻碍转化成机会。■

來信寄給 Elise Maiolino <elise.maiolino@mail.utoronto.ca>

> 移民在高信任的加拿大有被信任嗎？

Cary Wu,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 圖1



信 任反映了人们对于他人善意的理解。人们相互信任不只对于个体幸福是基本的，对于社会凝聚、经济成长、民主等也都是重要的。信任对于移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有许多外国移民人口的社会来说是如此，因为信任有助于社会整合。

加拿大是个高信任的国家。从分析加拿大统计局 2003, 2008, 2013 年的整体社会调查 (GSS) 可知多过半数的加拿大人口持续相信“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反之，全球上来说，只有 37% 的人口这么认为 (世界价值调查, 2010-2014)。

加拿大也是个移民国度。外国人口组成了

五分之一，有就是 21% 的总人口。虽然加拿大的点数系统说明选择了一群令人信任的移民，许多这些人还是透过难民和家庭团聚计划而移民的，于是有着比本地出生的人有更低的信任 (见图 1)。

若移民一开始有比较低的信任，那他们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会得到更多的信任吗？当讨论到信任的来源时，有两个理论解释：文化观点和经验观点。文化观点的学者相信人们从主要社会化学习到了信任，这个学到的信任在成人接下来的阶段不太会改变。经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人们信任的来源是社会经验，因此信任会因为不同的社会情境而改变。这个辩论的核心是人们什么时候会信任，是否学习到

>>

圖2A & 2B: 小孩青少年移民和成人移民的信任預測勝算比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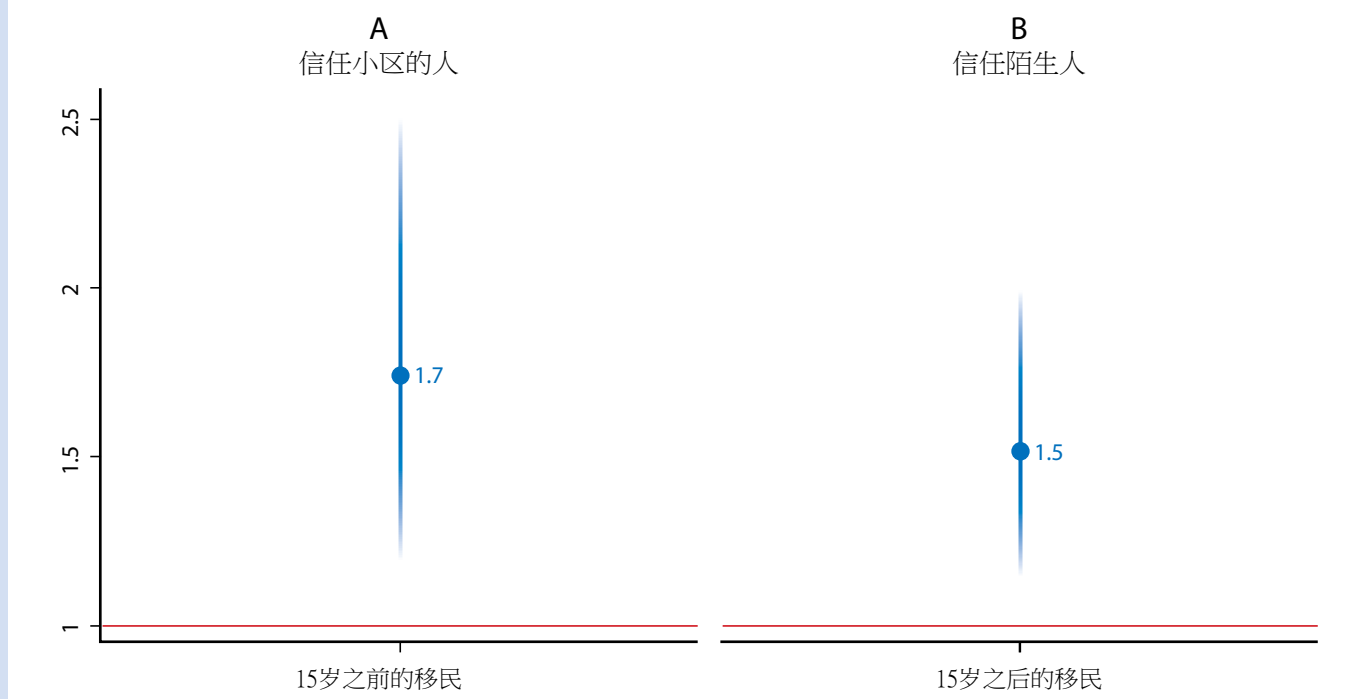


圖2A, 2B.

的信任会因为情境而改变？

为了判断是否加拿大的高信任文化对于移民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必须区别成人就来的移民和小时后来的移民，后者在加拿大经历了主要社会化。若信任是文化的，我们则期待年轻时候就来的移民在加拿大社会化后会有比较多的信任，而那些成年后才来的移民因为不是在加拿大经历主要社会化那么就会有比较低的信任。若信任是经验性的，不论移民的年龄，那么移民对于于加拿大的经验会有相似的响应，因此，信任上的差距不太会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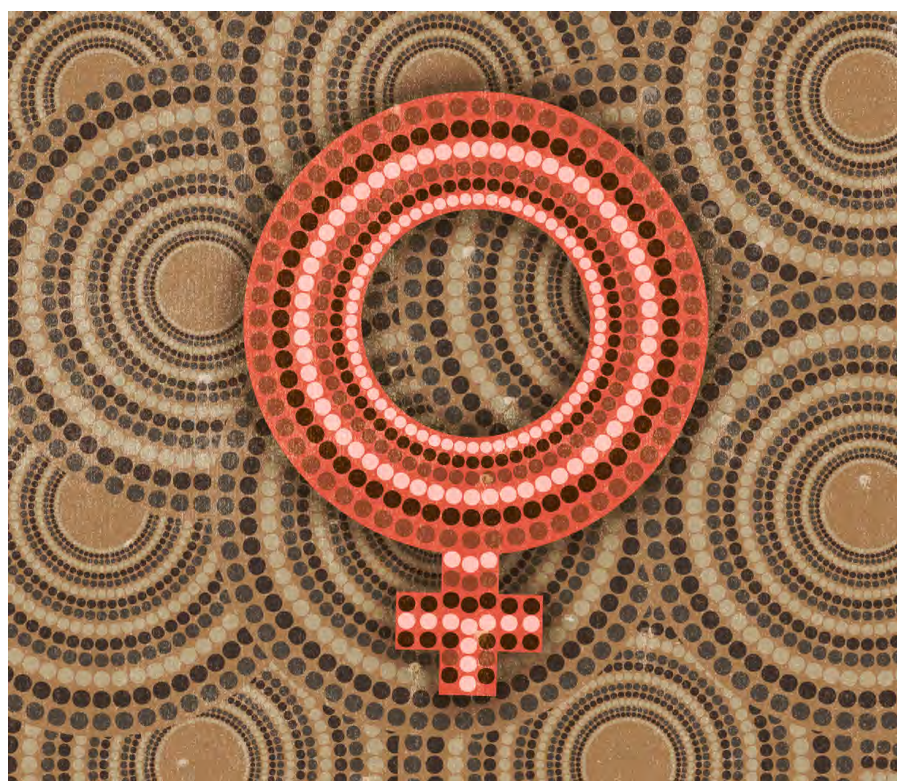
分析了2014年的加拿大GSS，我发现在15岁前来的移民有70%更高的机率会信任小区的人，而比起15岁后来的移民则多出了50%。这都是控制了其他人口特征的结果（看图2A和2B）。

总之，这个显著的差距显示了加拿大高信任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只限于那些年轻儿童的移民，因为他们在主要社会化阶段来到加拿大。整个结果对于信任的文化理论有很强的支持。■

來信寄給 Cary Wu <carywooruc@gmail.com>

> 交织性、本土性、性别、暴力

Maggie Walter, 原住民研究與領導中心副主席, University of Tasmania, Joselynn Baltra-Ulloa, University of Tasmania, Jacob Prehn, 原住民研究與領導中心副主席办公室, University of Tasmania, 澳洲



Arbu繪圖。

托列斯海峡岛民的女性遭受性别暴力的统计相当令人担忧。全国的原住民女性和女孩遭受家暴送医的机率是非原住民女性的31倍，超过半数原主民女性死亡导因于家暴。这样暴力本质也在一项研究中被再次证实：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女性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曾经遭受肢体和性暴力。以州和领土为基础的统计也

呈现了一样的恐怖景象：95%的住在Victoria原住民小孩因为遭受家暴而送医。西澳洲的原住民女性的受到杀害的机率是非原住民女性的17倍。我们认为，存在于这样的暴力的本土性和性别的交织性不是中立的，不是非历史的，也不是非政治和非文化的，也不是无关种族的。

统计资料中的不成比例的高比例也在其他英国殖民地国家中的原住民女性中找到。在奥特亚罗瓦纽西兰，美国，加拿大，原主民女性都比非原住民女性要更容易成为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这样的相关性说明了主要的解释并不存在于原主民、托列斯海峡岛民、毛利人、美国原主民、第一民族身上。英国也不是不够幸运到要殖民四个不同的地区都刚好其原住民女性特别容易受到性暴力。这些原住民女性也不是只受到原住民男性的暴力而已。因为很高的跨种族交往，有很大部份的施暴者是非原住民男性。然而，统计上的高比

“过去12个月有约1/4的原住民女性受到家暴或性暴力。”

例是原住民女性双重的性别和种族压迫的社会文化产物。权力的种族关系由英国殖民者所定义，和权力的性别关系交错，产生了施加在原住民女性身上的日常生活双重暴力。

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峡岛民的女性总是殖民暴力的第一线受害者。在战争的前线，女性都是遭受屠杀的牺牲者。其他女性，像是 Tasmanian Walyer，带领了反抗入侵的抵抗行动。当殖民掠夺开始，女性都遭受到性和肢体的暴力。在弗诺群岛巴斯海峡，从 1800 年开始女性被欧洲人系统性的绑架，被强迫当妾和作工。

一旦澳洲大陆被殖民者掠夺了，性别暴力，无论肢体或是性的，从没停过。在 20 世纪的多数时期，原主民中肤色较淡的女性和小孩通常更容易遭到性暴力。政策禁止原住民小孩的移除原生家庭，被称为“被偷走的世代”，主要是去把原住民同化的

白人社会，小孩不能讲母语、接触家人、文化惯习。估计认在 1910 年到 1970 年之间，每 10 个小孩就有一个被带走其原生家庭。有这个历史的家庭更有可能会有小孩被送医。全国中，殖民暴力的影响就是贫穷、社会、政治、文化的边缘化，并且一代传一代。家庭功能的不彰是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峡岛民的女性遭受到肢体和心里伤害的原因之一。

所以澳洲社会，包括澳洲的社会学，怎么响应施加在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峡岛民的女性的暴力呢？不幸的是，多数无动于衷。澳洲社会学就像澳洲社会一样，仍然是被殖民的。澳洲社会学没有人研究原住民女性遭到的性暴力。而事实上，原住民社会学甚至几乎没有。对于受到殖民主义好处的人来说，没有必要研究种族和性别的权力关系。而原住民和托列斯海峡岛民对于澳洲来说还是不方便的

存在。结构上，对于这个议题的冷感产生了对于施加于原住民女性的暴力的一种轻蔑的解读。就像其他原住民问题一样，该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社会学的解答。■

來信寄給

Maggie Walter <Margaret.Walter@utas.edu.au>

Joselynn Baltra-Ulloa <Joselynn.BaltraUlloa@utas.edu.au>

Jacob Prehn <jacob.prehn@utas.edu.au>

> 南非的性暴力和“矫正性强暴”

Kammila Naidoo,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南非, ISA女性与社会(RC32), 传记与社会(RC38), 临床社会学(RC46)研究委员会委员



Arbu繪圖。

> 记住 Khwezi 的故事

2005年，一位女同志 Fezekile Ntsukela Kuzwayo (Khwezi) 控告 Jacob Zuma 强暴，Zuma 是南非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第三位总统。这个2006年控告不但没有伤害 Zuma 的当选，还让他把 Zulu 的传统男子气概普及化。在他

的证词中，Zuma 认为 Khwezi 的穿著是性邀约。Khwezi 的指控也让她被放大镜检视、肉搜。在法庭上，Zuma 的支持者大声反同、性歧视、反女性主义，通常和 Khwezi 的支持者起冲突，叫做 One-in-Nine。这个团体强调了 1/9 的南非女性非常有可能被强暴至少一次。最后 Zuma 无罪，但是 Khwezi 却要流亡海外。

Khwezi 的故事显示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强暴受害者想要把施暴者绳之以法是很难的，特别是那些施暴者是有头有脸的人。恐同论述形塑了女同志的强暴之大众态度。尽管有 20 多年来的性别平等运动，男子性和异性恋的规范还是持续。在南非，一个交织女性的取径去解释种族、族群、性倾向、年龄、身体、阶级、政治位置等。这个反省也是 ISA 会长 Margaret Abraham 的看法，要去从全球各个地方立法建立一个关于性别和交织暴力的诸多面向。

> 暴力的男子气概

在南非，施暴者的逮捕并不常见，定罪率也很低。南非警察的 2016 年犯罪统计指出有 43,000 的强暴案例 (2015-2016)。虽然数字很高，有些分析者指出只有大概 1/13 的受害者是被非伴侣所强暴，

1/25 是被伴侶。對受害者來說，訊息很明顯，若是告上法院，你會被肉搜，被放大檢視。國家也暗示不要舉報強暴案件，這被媒體和社會論述把強暴常态化的結果，反應了男子氣概的文化。我們並不意外看到很多男性的研究參與者會默許強暴的行為發生。

南非的研究試圖去解釋暴力男子氣概的宰制，以及男子氣概的危機，但都著重在工人階級的施暴者。這個觀點來說，傳統男子氣概的規範被變化的政治經濟學和歷史遺產以及制度的性別平等所中斷了，這造成了男性的認同危機。公共和社會經濟的邊緣化也導致了幫派興起，暴力，這被男性用來試圖去恢復現狀。這個背景下，女性的身體被認為是工具，透過這個工具，男子氣概和權力控制可以維持下去。這個主張也在男女同志奮鬥去響應恐同暴力之下被彰顯，特別是“矯正性強暴”這個概念在南非是被用來指涉強暴女同志的詞。

> “矯正性強暴”

從2000年開始，有大概平均40位的女同志被殺害，每周有10位被矯正性強暴。質化研究也指出了施暴者聲稱的強暴會“治愈”女同志成為異性戀這樣的借口。此外，有些男性的研究參與者稱強暴代表了男性藉由強暴女性而展現男子性，而且是有正当性的，因為這是男性在證明其真實性。這些說法顯現了南非過去二十年來強暴女同志的容忍也伴隨著女性解放運動的興起。南非的後隔離憲法是全世界第一個禁止以性傾向為基礎的歧

視的憲法。南非也是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的非洲國家。因此某些男性和掌權者聲稱強暴女同志是一種矯正作法的言論代表了恐同和反女性主義的反撲力量。

> 結論

吊詭的是，強暴和其他性別為主的犯罪與暴力行為不斷發生，但南非的性別培力和平等也都在政治議程上。事實上，有力的游說團體最近一直強調2019年的女性總統。若要把性暴力控制住，那需要極大的努力去動員和組織。其也需要像是2016年打斷Zuma演講的四位女性，手持“記住Khwezi”的標語。這將會需要批判和強力的女性主義領袖的更新和重新浮現於學術、政府、公民社會中。■

來信寄給 Kammila Naidoo
<kammilan@uj.ac.za>

> 让波兰的家暴被看见

Magdalena Grzyb,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波蘭

Piasecki 事件在 2017 年 4 月发生，让公众集体愤怒。这个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是法律正义党政治人物。Karolina 出櫃，也控訴 Rafał 的家暴歷史。Rafał 和 Karolina 青少年時在教堂相遇，是天主教徒。她們看起來是波蘭家庭的模範，年輕，快樂，有兩個可愛的女兒。Karolina 報警了，但是警察没有采取行动。后来 Rafał 說服之下，Karolina Piasecka 放棄了控訴。

Karolina Piasecka 的公共出櫃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其对于家暴的证词也对于让大众提升家暴的社会认知有所改变。过去认为家暴是身体暴力，这只有在贫穷的家庭才会发生，但是事实上这是社会中的常见现象。家暴不只是因为贫穷。第二，其指出了极度保守右派政治的伪善，特别是法律正义党以其父权政治的粗暴。

> 回到過去：波蘭過去十年的女權

从法律正义党 2015 执政后，女性平权运动曾遭遇很大的反扑（见 7.1 期 Julia Kubisa 的文章）。期执政前，该党就强力反对欧洲理事会防治女性暴力和家暴的法案。

2012 年开始，期加入了由波兰天主教会发起的反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战役，因为被认为是威胁波兰家庭、传统价值、国家安全。而这里的预设是伊斯坦堡大会决议所称的针对女性暴力的结构因素，而因此国家的责任是铲除性别刻板印象。这个遇设备认为是波兰家庭价值的威胁，让家长管教小孩的价值受到威胁。法律正义党的政治人物拒绝波兰家暴的严重性，认为波兰男人尊重女人，并且法律禁止家暴。期认为家暴很少发生，而且只有当男性受到酒精影响后才会发生。2015 年，政府删减了 NGO 帮主女性家暴受害者的经费，认为这是歧视性的作法。而 2017 年 2 月，现任总统 Andrzej Duda 公開宣佈伊斯坦堡決議不是用於波蘭制度。

波兰有很强的天主教传统，教堂也在政治中拥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特别共产主义瓦解后。尽管 1945-1989 年的共产性别平等是有的，但是当女性可以工作、上学、生产，传统性别角色还是持续着，女性持续扮演次于男性的角色。“性别意识形态”的概念是被天主教会在 2012 年针对平等政治所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那些恋童丑闻的注意力，然后成立了一个天主教堂。

在这样政治氛围中，

Karolina Piasecka 決定走向公共，揭露其故事和挑戰公眾對於這個問題的拒絕。在錄音公開後，Rafał Piasecki 拒絕曾經毆打妻子，說自己成長在傳統家庭，基督宗教的價值，認為傳統性別角色證成家暴行為，證成自己的行為，相信傳統家庭價值，希望所謂的好妻子的實踐理性。

> Piasecki 事件的影響

Piasecki 事件變成了第一個高知名度的家暴事件。最重要的是 Piasecki 是知名的政治人物，屬於法律正義黨，推動家庭價值和恐同。這個案例對於推廣家暴的社會認知也是很有用的。總之，心裡的虐待已經被認為公共和法律制度認為是暴力的一種，雖然 Piasecki 的行為是極端的，但是許多女性發現這樣的行為在她們自己的家庭也層出不窮，但是不承認那是變態和不可接受的。

这个案例在媒体上（独立媒体和社会媒体）激起了辩论，公众响应去帮助家暴受害者的失败是主题。这也让强大的去发声的社会禁忌断裂了，Piasecka 解釋其訴諸公眾的決定逝去幫助其他受害的女性，鼓勵她們去離開不正常的關係，顯示家暴不是下層階級的

“这个案例让禁止发声的传统断了。”

家庭的特有現象。

› 不是偶發事件：家暴和法律正義黨

虽然 Piasecka 案例並沒有造成政治風暴，但是真正的政治影響才剛要開始。儘管 Piasecka 於 2017 年 5 月被法律正義黨驅逐出黨並被控告，該黨的政治人物繼續忽視問題。該黨的發言人 Beata Mazurek 說過度家暴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说法好像说有一种家暴是适度的、可接受的。该党其他人谴责家暴，但是也说家庭剧情也被用在政治斗争里面。Piasecka 案例不是地一個，也不是法律正義黨第一個毒打施暴自己妻子的人。2016 年的 Łukasz Zbonikowski 就被妻子控告家暴，但是公眾沒有太注意這個案子。2017 年的另外一位国会议员 Waldemar Bonkowski 也被妻子指控家暴、虐待、威脅、心理虐待等，但是他都用妻子心裡有問題來回應。當一個極端保守、傳統、基督宗教的政黨輕視那些該情境的衝要和容忍施暴者，其言論是對道德優越感和正當性去統治國家是有所影響的，這也揭露了政治冷感，而保守派和右派政治是父權的。

虽然遏止家暴的法律从 2005 年开始就存在了，家暴还

是在许多的家庭论述中被正当化。法律与正义党并没有正当化家暴，但是透过法律系统和官方言论，其助长了传统父权家庭的结构和女性被须被限制在私领域的结构。

在对于 Piasecka 事件成功地讓大眾有更廣大的社會認知，對於執政黨的家暴態度，以及其他公開反女性政治（像是生育權），這些都可能在長期讓執政黨有所傷害，甚至挑戰其父權狹隘的意識形態。這個案例顯示了需要社會學家去檢視和批判家庭結構裡錯誤的界線，以及公與私之間的連結。■

來信寄給 Magdalena Grzyb
<magdalenaagrzyb@gmail.com>

> 邁向零暴力？

by Sylvia Walby,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性別研究組長,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委員和會長(2006-2010)



百萬女性游行, London, 2014。

联 合国的 2030 年永续发展目标 (SDG) 其中的目标 16.1: “显著减少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死亡率。”而目标 5.2 则是: “中止任何针对女性或女孩的暴力。”

这些是乌托邦理想吗? 而世界正往反方向走去吗? 上述的是一个世界的愿景, 是一个多国家、国际、全球公民社会的蓝图。而去发展知识基础去建构蓝图是社会学的任务之一。

这个看法的实现需要建立一个关于改变的理论。这需要一个暴力和性别在社会中的理论, 也需要好的概念化和测量方法去研究暴力。

> 什麼增加或是減少了暴力?

经济发展是原因之一吗? 暴力发生率似乎在经济不好的地区比较高。而性别平等也让女性比较可以免于暴力。而性别平等如何提升? 经济发展或许不会带来性别平等, 也有赖于是否是新自由主义或是社会民主的改革。

针对性介入和支持服务的影响力为何? 女性主义提出多重介入, 像是收容所, 援助专线, 专业顾问, 法庭等。服务的增加也会有更少的暴力, 因为这些让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有了面对暴力的韧性, 但是这些服务很

贵, 并且也连结到了更广泛的性别不平等中。

刑法体制重要吗? 法律的改变去把针对女性的暴力罪行化已经是世界趋势, 但是女性遭受的暴力并没有减少。

民主重要吗? 我在我的著作《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ies》中發現女性被害率再有高比率女性國會的國家中是比較低的, 性別化的民主深度是有影像的, 因為之間有反相關。性別化的政治平等也很重要, 不僅僅是性別化的經濟平等重要而已。

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集中在全球北方导致了性别经济不平等的增加以及搏

>>

节政治减少了福利措施。潜在上这个时期是一个测试高性别不平等和撙节，以及缩水的社会福利会增加性别暴力。

要研究这些理论，那就必须知道暴力是增加还是递减，以及暴力发生率如何因地点或社会团体而改变。这需要好的测量方法，考虑性别因素，但我们还是缺乏这点。

> 如何测量暴力？

测量方法很重要。尽管公民社会中的活动，对女性的暴力是在官方统计中很难看到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新的国际统计的犯罪分类并没有把犯罪的性别分类纳入，把性别当作次要和可有可无的选项。此外，多数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并没有报案。犯罪统计调查也已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暴力受害者更可能回答调查，比较不会报案。虽然受害者的性别是有被统计的，但是重复性的暴力事件并没有被纳入，若有，也没有完全被计算。

历史上，多数国家的的犯罪统计调查，包括美国和英国，都有设定一个犯罪事件的上限数量。这开启了统计理的性别偏见。我们 (Jude Towers, Brian Francis, 我) 重新审视了英格兰和韦尔斯的犯罪调查资料，我们发现若把上限移除，把所有的犯罪都纳入，那犯罪率其实上升 60%，针对的女性暴力数量上升 70%，家暴也多了 70%。

使用这个新的测量，

Walby, Towers, 和 Francis 发现暴力犯罪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于英格兰和韦尔斯的数量上升了。对女性的暴力也上升，但是对男性的没有。这也连结的家暴的增加，不成比例地都是针对女性，这些改变在旧的方法下是看不见的，因为旧方法不成比例地减少了犯罪的重复性。当累犯的犯罪事件（不成比例针对女性）被看见了，那暴力犯罪的增加也被测量到了。当老旧的方法系统地低估暴力事件的累犯，那暴力数量是没有增加的。而这样的改变是无法在没有纳入性别面向的前提下被理解的。这些英国的发现支持了连结经济和暴力，以及这被性别化的连结的理论。

发展一个强韧的测量指标去比较不同时间、地点、团体的暴力犯罪率需要一个一致的暴力定义和测量方法。有两个相反的取径（在 SDG 的 16 和 5），但是两者中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性的纳入性别。一个取径收集暴力的数据，但是没有女性或男性受害者的信息。另外一个只收集针对女性的暴力数量。现在是时候去纳入性别面向了（受害者性别、施暴者性别，施暴者和受害者关系，关系中是否有性的成份）。我们最近的工作是和十几位学者组成团队，提供了一个新的测量架构去测量犯罪，可以支持这样的发展，让比较研究更可能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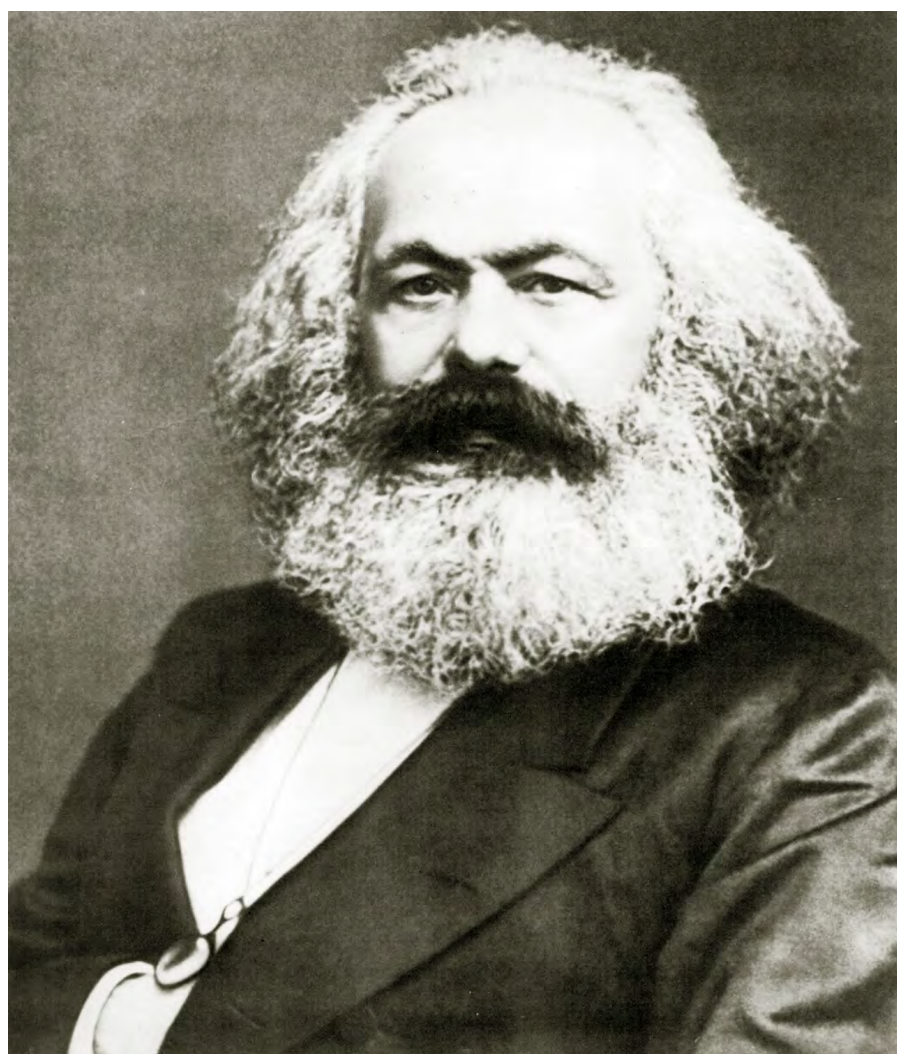
> 針對女性暴力的危機

在英国的危机从金融上升到经济，然后再到财政和撙节。现在的危机是暴力。暴力的增加不是普遍性的，而是针对女性。而且熟识者之间的暴力更常见累犯。经济危机也是性别化的，财政影响也是，暴力也是。

新的批判社会科学要挑战安全的意义，而把对女性的暴力纳入安全意义的考虑是重要的。这意味着把暴力考虑到社会学理论中并且审视测量方法论。这是一种公共导向的社会学，也是一种社会学可以贡献于永续发展目标去减少暴力的方法。■

來信寄給 Sylvia Walby
<s.walby@lancaster.ac.uk>

> 馬克思200年 冥誕



Karl Marx 于1875年。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2008-9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再次提起兴趣。特别是其《资本论》似乎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和当泰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影响，像是社会不平等的全球兴起、失业、不稳定就业、贫穷、生态浩劫等，很有帮助。但是当这些重要问题让社会学家和媒体或是社会大众重新发现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其理论仍然是被争论的，而且对于马克思的研究相当多，遍布全球。马克思的200年诞辰让《全球对话》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去反司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社会学。这个论坛从讨论其哲学根源开始，然后迈向讨论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义和反思，以及其不足之处。透过马克思，我们讨论了劳动、国家、法律、社会不平等的议题。■

> 马克思和社会学， 2018

G. M. Tamá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匈牙利



马克思雕像在Karlovy Vary, 捷克。

韦伯在《General Economic History》(1919-20) 中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整全的系统，可以满足西方的每一个人的需求，其前提是资本的理性计算（记账）最为规范，适用许所领域，特别是 1)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必须在司有企业中被独立分配为自由可丢弃的财产。2) 存在着没有“非理性”的字由市场。3) 也存在理性的需要，就是透过可计算、机械化的科技去生产、交易、运输。4) 必须存在理性的法律系统，课预测和透明的。5) 自由的劳动必须可得，也就是人必须法律上臂赋予去出卖其劳动力，并且要在市场上被交易，透过经济计算而被迫执行。

Marcel Mauss(在 1901 年和 Paul Fauconnet 所写得百科全书文章中) 类似地认为，没有人可以发明一种社会生活是外在于心智的。像是信用、利息、工资、交换、货币等。即使是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勤俭、繁荣、奢侈、冒险、害怕、努力、“企业精神”等都不是完全主观的，但是总之“客观”的货品作为“社

会文化”的结果，其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特质。

这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或是马克思本尊），这和社会学作为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连结的学科来说，是不一样的。

> “布尔乔亚”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社会分析？

什么是布尔乔亚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到政治哲学的所有分支）？什么解释了这个启蒙以来和形上学以及神学格格不入的知识体？

简单说，启蒙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来转向了，从客体性到物质主体性，其意志的主宰作为自由的原则。在法国，这被称为道德和政治的科学，就是最终的康德的对于古老教条的批判，这教条宰制了“西方”（包括拜占庭，犹太教，伊斯兰教）思想和希腊思想。

史宾诺沙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不论有多么不一样，都承认了人类是自然的存有，是会被因果机制所影响的，而其心智被热情和 *conatus sese conservandi*—在道德选择中是自由的，但是对于完全、客观、中坳、整合的知识和理解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阻碍是逻辑的和心理学的。若是神的知识是主观的，也就是信仰的福音，那么道德科学是受限于主观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共同点或许是，知识和自由的准则是主体性，可以被理性检视，而后者最终被逻辑和数学所形塑。

被隐藏的信念是，所谓的“实在”是直觉上可得的，所以可以被理性检视和对话性解释，也就是去显示其矛盾。

黑格尔的历史角色是去显示什么被认为是主观的。主观“精神”实际上是客观的。然后心智开启了概念（而非从外在世界演绎来的），康德描述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主观性，并被认识论的限制所局限了，或是被认为无知的，但是，相反的是，那是知识和自由的源头（实质或是抽象）。

若把事情复杂化一些，黑格尔也提出，客观性以两种面貌出现：“客观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制度”，也是正向性：“错误客观性”（简单说，没有自由的理性）以及“绝

>>

对精神”（理性作为自由：哲学）。

就是这个“客观精神”让社会学祖师涂尔干称为“社会”。换句话说，人类世界是完全不同于人类意象，选择，欲望等等的。那是一个结构产生重复和永远结果的世界。人类的期待反性和表达了制度结构，而不是融合之。这些结构被称为“事实”，其改变是不可预期的，导因于不可见的组合和外部的的事件。

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也回到康德，经验和超验的二元性不断出现，什么事“事实”，“结构”，或是“事物”只是表征，其主体是被藏起来的，最有名的就是劳动（人类生产活动）是隐藏在价值背后的（资本过程的引导原则）。劳动也在拜物的商品下去体化。那不是事物，而是人类主体活动。

事物，制度的“客观精神”是一个表面，因此整个社护的制度逻辑（经济、国家、公民社会不在分立）也是个表面。但是从客体和主体的观点来说，劳动是分裂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不一样。不论什么直接发生，那都是个幻象，真正的本质是藏匿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假面是戴上了客体的配件）。其应该被揭露（概念上被消灭并透过理论（批判政治经济、哲学、等等）以为了去重新捕捉主体人类活动的自然本质，在这里需求是不被价值所统治的。

从古典的社会学观点来看，主要的点在于：“绝对精神”如何导引了“客观精神”，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什么的价值的结果？又，阶级的源头、历史、功能又是什么？因为社会学把人类群体看成是“事物”（永存或至少是持续的抽象物），所以会对人类群体怎么被形塑和分配、和国家的关系、意象的社会政治变迁等感兴趣。

› 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和剥削

马克思可说是不回应的。在和早期的共产党宣言有所矛盾的情况下，其后来的追随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前后有阶级的存在。（阶级是历史的）阶级是个价值和资本的次要现象，“阶级文化”，“阶级生活格调”，“阶级组织”则又是该次要现象的次要现象。

对于马克思唯一重要的阶级是无产阶级，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说，是被建构的且不是社会的一部分（自为阶级？）。这是对于这个阶级的拒绝，并且是在布尔乔亚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外的（经济、政治），社会科学预设了共享人

性的人的互动，但是实体化并不允许这个。

因为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活动让其实体化，所以这是不是阶级之间的互动，而是资本的特质。剥削不是什么布尔乔亚故意在做的事情，剩余价值是被用来积累资本的，不是去伤害劳工的。剥削不是一个任何国家可以控制或是修改的，所以这不是个“政治问题”。这不是不平等的问题。

不平等是个社会学问题，但是剥削却不是。转变实体化，商品拜物，剥削到不平等，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荒谬的（转变成“政治问题”希望可以逐渐解决）。这是为什么社会学的问题不能被马克思主义回答，反之亦然。



來信寄給 G. M. Tamás <gmtamas@gmail.com>

> 超越资本主义 的马克思传统 愈益相关

Erik Olin Wrigh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美国



马克思200年冥诞中找寻答案。Marco Gomes摄影，São Paulo, 巴西。

没有任何的思想比马克思主义要更能解是资本主义如何迈向自我毁灭是导因于内在的矛盾的，这些动态同时也开启了建立另一个繁荣社会的结构可能。这个论证的第一个部份包括了一个很强的预测，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宿命的预测：长期来说，资本主义无法永续，社会秩序瓦解，不可避免走向毁灭。第二个部份比要没有那么强，就是资本主义的动态毁灭资本主义本身是开启了新的历史契机（特别是因为生产力量和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和集体能动性，就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可以利用历史的机会去建构一个解放的另一个世界，手段就是革命。不论这个是否会实现有赖于很多其他过程的配合，像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健社会团结的浮现，政治组织和斗争的形式的发展，等等。整体来说，这个理论体

现了决定性和非决定性的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宣称与精神。

这个决定性和非决定性的二元性宣称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政治运动来说如此吸引人的地方。非决定性的元素证明了集体能动性的重要性，也证明了个体加入斗争去建构新世界的意愿。而决定性的元素给了乐观主义坚强的理由，即使革命路上充满阻碍，让人胆怯，但是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相信历史在我们这一边，而且最后革命终究成功。

我现在活在一个和马克思所处的非常不同的世界。有些马克思的预测是完全准确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全球系统，遍布世界的角落。生产的力量变发展得很令人惊讶，资本主义市场也深深地穿透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面相，严重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持续现象。但是

>>

其他的预测，虽然没对于超越资本主义来说很重要，但是没有实现，像是工人阶级没有团结，反而越来越分裂，让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所需的团结没有成型。资本主义也被证明越来越顽强，有新的积累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也更有弹性，更吸收人民的需要，也很有效率的响应需要。最后，那些试图建立另外一个世界的努力的社会革命的悲剧历史也让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受到影响，乐观主义对于建设另一个世界是很重要的。

在21世纪，我们不再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运动定律”作为不可避免的毁灭了资本主义自身，并且自动开创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在相关了。特别的是说，还有四个重要的假设仍然对于建构一个另外的世界是重要的：

1. 资本主义阻碍了人类繁荣的实现。最直接指标就是即使现在高度发展了，还是有许多持续的贫穷问题。而资本主义的危害远超出物质的剥削，还延伸到其他领域，像是平等，民主、自由，社群。而这些资本主义的危害根源在于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开启了这些危害，透过剥削、宰制。而经济权力转变到政治权力、毁灭的竞争形式、市场的扩张、侵蚀了社群和互惠。许多的研究都指出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危害。

2. 资本主义的动态是有内在矛盾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达到稳定的均衡，让所有的东西都被整合到功能系统里面。即使没有内在的矛盾让其无法持续，其也会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让转型斗争不断出现。

3.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或许马克思传统最基本的主张是一个解放的世界，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因为资产阶级控制了生产和投资，这要被激进的经济民主所取代。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改变从批判资本主义到解放的社会科学。去说一个解放世界是可能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不仅仅可以想象，还可以被实践，还可以被可望的，可行的，可达成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就是主张激进经济民主会完全体现解放的价值，而且一旦建立了，是永续的，而且有可信的历史情境让一切可以达成。

4. 转型需要建设的阶级斗争，而非只是抵抗。要把资本主义转型成经济民主需要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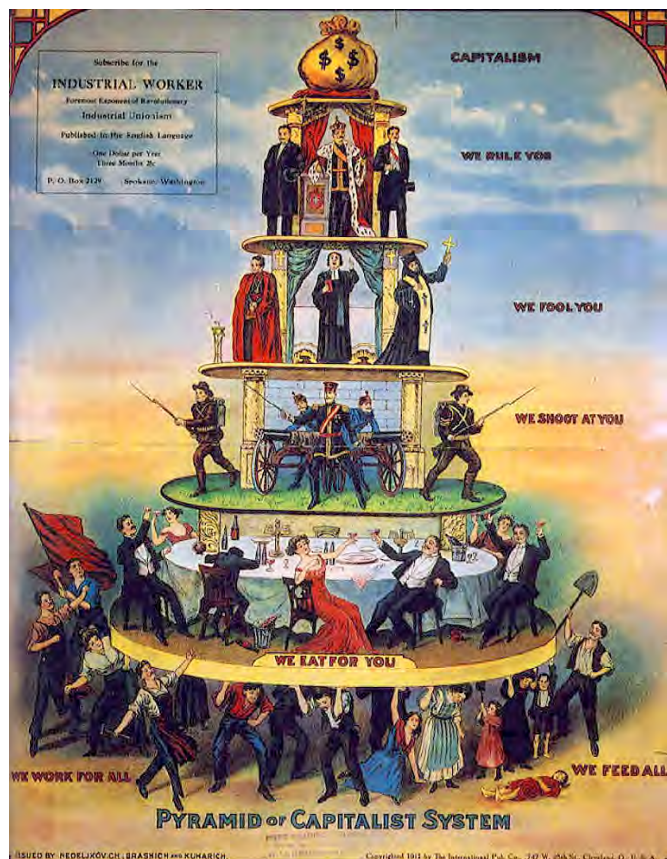
的行动和由下而上的动员，虽然精英的联盟是重要的，但是社会转型的解放不能只靠精英。解放的转型需要更比只是反对资本主义更多的斗争，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制度要体现解放的伟大理想。在马克思主义原本的理论中，建设的转型是被认为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革命断裂之后，工人阶级一旦掌权，就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了。在21世纪，这不再是个可信的策略了。若是激进经济民主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那么要在既存的社会中去建立民主制度还是被资本主义所宰制。

这四个假设是21世纪解放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断前进的发展的核心。■

來信寄給 Erik Olin Wright <wright@ssc.wisc.edu>

> 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Alexandra Scheel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德國, Stefanie Wöh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FI Vienna, 奧地利



金字塔資本主義系統

近年来德国兴起了一股“马克思复兴”的热潮，大家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的看法是对的。大家都解释，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也带来的社会动乱，生态危机，自我毁灭的经济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复兴了。

> 縮小在馬克思主義復興中的女性主義差距

然而，更新的对于马克思和其对于政治经济的批判的兴趣并没有参照女性主义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这些女性主义分析从来没有变成左翼对于马克思主义讨论的素材，因为女性主义不在这场辩论的任何一方。一方面，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发展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理解

社会问题然后又不和性别脱节。这个角度分析了资本剥削和全球的生命毁灭。这个角度不仅分析了权力和宰制作为积累的机制的过程，也指出了父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也对于之前和现今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程度抱持批判立场，马克思主义声称要改变不平等和剥削，但是鲜少承认性别关系是这个的核心议题。此外，生产和再生产的分开，以及劳动的性别分工，其马克思是有提及的，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内出现。

> 女性主義立場

这个双重的批判也仍然存在于马克思的200年冥誕：父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何？什么样的程度上资本主义模式的生产不是性别系统，而是种族系统？文化象征的压制形式怎么和其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压迫互动？以下我们总结这些辩论的重点。

> 生產和再生產

在生产 and 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女性主义辩论的核心。女性仍然做多数的无偿劳动，像是家务和照顾工作。把性别的劳动分工归类作为劳动的自然分工遮蔽了这个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组成部分，从来没有被贬值过。全球的劳动分工和对于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剥削也是女性主义辩论中的核心之一。后殖民和社会的女性主义批判强调全球压迫和剥削，以及全球南方的受宰制女性，并且批判其被整合到全球生产和照顾炼之中。此外，代理孕母不但被认为世新的再生产科技，也形成新的剥削和劳动分工。这个脉络下，女性主义的观点也分析了国家怎么维持了这样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在工作和性的场域，以及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条件。其指出了一项事实：社会再生产必须在全球化的脉络下被观看，其紧密地和全球市场、金融、迁徙等交织。因此，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化过程影响了社会再生产服务的提供的条件。例如，当家庭失去了社会基础或是必须被迫迁徙，像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就发生了。

>>



女性的工会。Kheel Center摄影，Cornell University。

我们同意 Nancy Fraser，預設資本主義的危機基本上決定了三個未解的問題：第一，生產和再生產勞動的關係。第二，自然的剝削。第三，全球資本主義中的國家權力。除了這些關於國家能力的轉變的衝突之外，資本主義中主體化的意識形態面向也是酷兒女性主義分析的相關主題。在這個賣落下，社會在生產如何以及是否可被概念化成異性戀霸權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 替代和持續的挑戰

争议的问题仍然持续：替代的世界怎么被发展？谁是或将会是“革命的主题”（除非扬弃这个概念）？而解放的潜能从哪边来？例如，我们值得去考虑是否马克思主义中的概念还是用于理解当代问题。像是 Ingrid Kurz-Scherf 建議的，我們或許需要一個更貼近的資本主義理解，以及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知識，然後才可以去非商品化的工作領域被看見？最後這些在資本主義之外的領域有可能帶來環境和勞動的剝削的終結。“照顧革命”的取徑由 Gabriele Winker 所追求，這強調了照顧領域的集體組織，移除資本邏輯和剷除有償和無償勞動的分隔。

后殖民和女性主义观点进一步要求更整全的主体观点，因为白人、西方、男性的阶级主体是马克思的重点，但这个已经不再有转变的能力。

> 學術的新自由主義和批判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脉络下，批判知识的生产条件和女性主义的批判已经变得更加困难。新自由主义个体化的过程中，对于各种主体作为转变的集体意志的看法越来越被质疑。

大学中，女性主义继续要处理男性中心主义，但是一直被可用性和可获利性的判准所检视。

在这个背景下，挑战是去发展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多元的批判会同时也是边缘化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学术和左派对于马克思的接受发现，因为他们没有对于男性中心的预设进行反省。■

來信寄給

Alexandra Scheele <alexandra.scheele@uni-bielefeld.de>
Stefanie Wöhl <stefanie.woehl@fh-vie.ac.at>

> 馬克思和國家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马克思没有一个整全性对于国家的批判，没有把国家看成是阶级宰制的一部分，或是政治过程中的国家权力行使。此外，虽然其作品是政治和理论的，其没有提供一个延伸或是一致的分析主题，像是政党作为组织，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革命策略，包括议会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范围，无产阶级独裁的形式，以及国家如何可能消失。

这不代表马克思（或是其一生的合作者恩格斯）忽略了这个问题。相反的，他们从许多方面研究了国家。包括了模拟于马克思对于古典和通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政治理论。包括了对于发展、变迁结构、阶级特性等的历史分析。特定政治时期或是件的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的分析。也分析了前资本主义或是当代社会的阶级基础生产模式，超越了欧洲和北美的范围。更策略地，政治地启发解释那些可以形塑于劳动运动中的政治辩论的变迁点。其分析也延伸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平衡，战争和和平的政治？

为了简化之，我们可以指出三个马克思对于国家解释。一个宣传式的解读是把国家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然后形式经济宰制的权力，维持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这个看法是恶名昭彰的，但是有着立即的宣传和策略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其宣称了统治机器是致力于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是的。除了这个宣传价值，

在欧洲和北美的有限选举权的前提之下，这个看法也是有意义的。选举权的1870年代的扩张会让整个事情变得复杂，让议会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放上议程。更历史的读法是把国家看作一个自主的实体，可以管制阶级斗争或是操作政治阶层的私有利益。这个看法很有名，也很有启发性，看以在马克思对于1850年代路易波拿巴法国的分析可以看到。的确，马克思曾经说波拿巴建立了一个罗马国家，其军队由波拿巴三世控制，然后代表自己，反对社会而非代表社会。有些评论者提出认为第一个看法典型化了阶级斗争的正常时代，以及后来的例外时代的阶级斗争是停滞的或是受到社会威胁的。这个看法采取或是不当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去看待宣传的论证，但是这是需要历史分析的辅助的。

问题是这个建议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第三种的阅读方式，其根植于马克思早期对于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重塑之，并且在对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文章中重新清楚阐明。这里，国家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异化形式，奠基在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隔上。这个分隔以不同的阶级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以资本主义形成的不同方式出现。然而，像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1871)中说的，国家权力是“总是维持秩序的权力，就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而有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从属和宰

制”。可是，就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证的，主权和政治宰制的形式是连结到剥削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这包括了主权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不是直接的宰制阶级的统治。这个国家形式是可能的，因为剥削是透过正式的劳动市场的自由交换的中介（尽管在劳动过程中的绝对权力控制）让阶级透过由超经济强制和义务社会连带中而来的生产自由而被决定。这让经济和政治的剥削与宰制的制度分化得以可能，然后伴随在宪法国家的限制下的经济阶级斗争，市场关系，政治阶级斗争。

然而，这是一个脆弱的关系，并且依赖于一个特定阶级妥协的制度化。的确，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了民主中的整全的矛盾。虽然这产生了普遍选举权，带给了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社会奴役的状态被永久化了，也巩固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透过保证私有财产。政治稳定性需要被宰制阶级不要试图从政治解放迈向社会解放，然后布尔乔亚不应该坚持政治复苏。而制度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分隔以及矛盾也解释了马克思鲜少诉诸于直接经济的论证去解释政治体制的发展或是特定政策的内容。因为这些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斗争动代而非立即的经济环境。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矛盾，其更具体的分析也仔细地考虑了国家形式，政治体制，政治论述，政治力量的平衡，等等。

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个取径是相互一致

的，而且是对于今日的政治分析最有用的。可见的是，我们须要更长的一篇文章去讨论具体案例和马克思对于全球市场整合的讨论。但是我想前述已经足够显示如何去增进马克思的分析了。■

來信寄給 Bob Jessop <b.jessop@lancaster.ac.uk>

> 資本主義的Landnahme 研究法律的新馬克思主義取徑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UERJ), 巴西



原著(水彩画在20 x 30的版上, 2011), Filipino painter Boy Dominguez. "Green Grabbing", JPS Special Issue 39(2), April 2012. James Fairhead, Melissa Leach和Ian Scoones编辑。

> 马克思主义和法律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很多是以 Evgeny B. Pashukanis 对于法律形式的批评。其起始点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取得价执行是, 所以具体劳动是透过商品交换的方式去实现。这预设自主和平等的商品持有者意志。这样的意志只有以法律形式存在。法律形式因此开启了一种介于不同具体劳动之间的抽象平等, 让自我生产的不平等产生。法律因此取得了拜物的特质。

传统上对于法律形式的批判是分析法律的结构, 但只有在金钱被转换到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时候。这解释了为什么宰制获取了抽象宰制的形式, 对于生产者的劳动的立即挪用如何变得不可见, 以及在不等与不平等之间如何交换。但是资本主义会自己简化成这个循环模式吗?

> 積累和 Landnahme

资本为了继续成为资本, 那就必须总是被赋予价值。这需要比必要更多的劳动, 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这个无穷尽的过程必须处理可能的让创造的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然后就会有过度积累, 这会伤害获利。这个阶段中, 资本必须掌握其他的社会空间去让剩余价值流动, 开启新的价值府与的循环。这些动态不会和等值交换的原则相应, 但是会和掌控这些因赋予价值而生的空间所需之能力相应。这是一个继续的原始积累形式。

马克思的作品中, 原始积累被理解城市资本主义生产的起始点。其过把生产者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开来, 导致了对社会团体的暴力取得, 也造成人们可以自由贩卖劳动力。罗莎卢森堡任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因素, 只有剩余价值得很有限的部份可以在生产地区被挪用, 系统必须总是转向外界的非资主义去实现其运转。这样的过程透过明显的暴力而成为特征, 戴维哈维更进一步分析资本如何克服过度积累的危机, 并透过剥夺而积累。从这个观点来说 Klaus Dörre 發展出了一個 Landnahme 理論: 資準擴張作為永遠和暴力的商品化, 這是對於上外商品化的外界所進行的商品化。

在 Landnahme 階段, 法律有不同的特徵, 這是如同 Pashukanis 所言的。而盧森堡也說在相等價值的交換中, “和平、財產、平等, 作為形式、規則”。這意味著“他人財產挪用轉變成財產權, 剝削轉變成商品交換, 階級宰制變成平等。”此外, 在非資本主義空間中的奪取, 盧森堡認為“殖民的政策、國際貸款系統、私人利益政策和戰爭規則, 這些就是暴力、作假、壓迫變得重要的地方”。總之, 法律運作成是種合法暴力和表達對於不平等的診斷。

Landnahme 因此透過國家發展而去激起把既有財產關係進行暴力轉變的。這個模型是法律改革的結果, 這目的世代換集體和共同的財產關係為私有關係。

此外, Landnahme 隱含著空間的再結構: 地方人口被驅逐, 一旦被趕出其共同公共空間就成為了“自由”的工資勞動者, 也要被規訓

>>

適應到生產鍊中的新角色。因此，除了共同空間的奪取，法律讓被剝削者的控制更容易。

>Landnahme 和法律

社会法律的 Landnahme 的再生產有三個階段：

1) 法律他者化

法律的他者化是个象征过程，反应了论述对于非资本主义外在世界的特征化为篇成汉次等的他者。主要工具是人权。

人权的普世特质默认了人性的内在价值的存在，认为所有人应该被平等对待，法律的保障因此是普世的。所以，若个人有人性，但是行动是可以违反人性的，那人权的责任就是去对抗偏差。这是一个正义判准的前提，被用来判断社会实践。

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这个开方建造了一个空间的阶层，一方面，文明的空见有着现代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则是不正义或是非理性的规范。但是这个区别反映了事实上现存的力关系。这个意义上，正义的判准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的普世化。这些人使用去强加特定的利益。人道的论述因此变成一个外在介入和殖民的推动器。

2) 私有化的法律工具

一旦外界世界被特征化成他者，商品化则发生。为了推动这个过程，法律发展出了一种攻去让公共、集体、共同的财产转变成私人的。这些工具让去管制化、私有化、开放给全球市场更加容易。他们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中出现，财产的贩卖，公司出售、地区出售等。公与私的伙伴关系。财产或是公共服务管理转换到私人公司。这些设计都是以法律小偷的方式出现，其中国家在效用推动的正当化下，把人从土地上移走，重构土地以获取价值。

3) 刑法的使用

在分析“血腥的立法”时，马克思描述了刑法的使用是一种把农民从其土地夺取而来的平行。当农民被驱赶出来变成自由贩卖劳动的人，他们没有完全被吸收进到工业记中。农民透过其他实践社会化，没有对应到新的劳动和生活方式。他们被强迫要调整到新的环境的规训，这是透过强制性的立法反对流浪人。

这个刑法的运作模式重复了 Landnahme 的過程。法律技術通常被用去讓空間的私有化和集體與社群或地方人口的破口，也就是讓他們可以自由販賣勞動力。一旦人自由了，刑法就被用來規訓勞動力，在現在的脈絡下，這意味着規訓不穩定和彈性的工作關係。透過貧窮的罪行化方式，強迫人去進入不穩定的工資勞動系統中。

> 結論

社会法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有两个交缠的观点。在相等循环的交换中，法律以抽象絀等和自由的形式运作，这连结到了商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循环，法律成为了合法暴力，也就是上述的三个阶段。考虑相等循环的交换会形成过度积累，其总是达到了临界点，需要新的夺取但是非商品化外界世界的驱动。因此，社会法律的资主义再生产边缘化了，透过持续的在拜物法律形式和合法暴力之间的异化而成为可能。■

來信寄給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uerj.br>

> 印度的马克思 和社會學

Satish Deshpande, University of Delhi, 印度

大概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学院马克思主义比政治马克思主义还显著。但是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不仅是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是比学术还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讨论非西方的马克思和社会学时，放到更广大的脉络是很重要的。

印度共产党 (CPI) 成立于 1920 和 1925 之间，在 1952, 1957, 1962 的选举是印度第二大政党，不过事实上他比第一大党印度民族议会党的 360 多席还要多 30 席。可是，CPI 是全世界第一个透过民主选举组成政府的共产党，在南方的 Kerala 省（现有 3 千 3 百万人口）。CPI 马克思主意者，或是 CPM（1964 年分离出去成立）于 34 年中（1977-2011）的 West Bengal 省份当选执政。但是共产主义的选举胜利在今天式微了，导因于印度政府和以中印度地区为主的地方族群的毛主义团体之间的不断的武装冲突，这主要发生在 Chhattisgarh（2 千 6 百万人口），其影响的另一个比较有限的来源是学生组织和马克思党派或运动的结盟。

马克思主义也在印度的学术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在历史、经济学、政治学中的比社会学还大。社会学中有三位学者让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要，三人都担任过印度社会学会的会长。《》

最早的是 Dhurjati Prasad Mukerji (1894-1961)，其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於 Lucknow University 的經濟系和

社會系任教 (1922-1954)，Mukerji 主要對於馬克思主義方法有興趣，也是其《On Indian History: A Study in Method》(1945) 一書的主題，他自稱是“馬克思學家” (Marxologist) 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其教条主义倾向会让这个取径无法分析印度的脉络。

第二位 Akshay Ramanlal Desai (1915-1994)，其是被認為對於印度馬克思社會學發展最有貢獻的人。其很晚才進入學界，一開始他替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組織工作，其 Bombay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論文在 1948 年出版，名為《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Indian Nationalism》。其仍然是經典，因為再刷 12 次，再版 6 次，有許多印度使用的語言的翻譯。該書使用“唯物主義史觀”去鏈接被殖民主義驅動的經濟轉型和最後導致民族主義興起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變遷。Desai 的論證是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在殖民時期就開始，並且和 CPI 與 CPM 的政黨軸線是相對的，而政黨選稱印度社會還是半封建社會。除了民族主義，其也發表對於農民鬥爭、人權、國家對人權的侵害的書籍。Desai 在 1951 年加入了 Bombay 的社會學系，然後直到 1969 年都擔任系主任。其貢獻在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栽培學生。

Dattatreya Narayan Dhanagare (1936-2017) 和英國的馬克思社會學家 Tom Bottomore (University of Sussex) 合

“在世界多数地方，马克思的影响在政治多过于学术界。”

作。Dhanagare 在 University of Pune 教书，其著名著作包括了《Peasant Movements in India》(1983) 和《Populism and Power》(2015)。透过其著作和学生，Dhanagare 對於印度的階級分析有著重要的貢獻。

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历史（是主流观点）和经济学（是重要的一派）中越来越重要。国际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些学科中也可以从所谓的“生产形式的辩论”还有贱民研究学派中找到。

从 196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早期，整个世代的学者，多数是经济学家，都从事研究印度农业的生产模式特征，特别是殖民时代至今的时期。从 Maurice Dobb-Paul Sweezy 關於歐洲的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轉型的辯論中找到靈感，印度的生產模式辯論聚焦在封建殖民時期的農業模式轉型。其提出了定義農業資本主義的問題，也試圖去更細緻的理論化經驗現象，像是工資和家庭勞動、剩餘價值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使用，在勞資關係中的經濟強迫、生產殖民模式的可行性、還有馬克思對於形式和真正勞動被資本宰制的區分之意涵。

而贱民研究学派的学者从 1980 到 2000

早期也批评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其对于印度民族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聚焦在精英而非贱民阶级。其以葛兰西的理论去诠释精英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没有霸权的宰制”，特征是“印度布尔乔亚代表民族的失败”，以及贱民动员的弱点。贱民学派历史学家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还有下层的抵抗与动员。虽然这个学派被解散了，但是还是活跃在学术和知识分子界。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印度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的必要一部分（除了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今天的印度还是很重要，但是变得更扩散和混合，反应了广大的全球趋势。■

來信寄給 Satish Deshpande
<sdeshpande7@gmail.com>

>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Michelle Williams¹,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RC02)和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成員



在马克思主义里重新思考种族和阶级？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解放和压迫的理论启发了无数学者、政治人物、运动者，遍布全球，横越150年，然后成为了一个知识领域。少数的知识分子和激进运动者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许亚当史密斯、达尔文、甘地、耶稣、先知穆罕穆德、佛陀可以相提并论而已。

马克思同时试图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然后反抗和改变之。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共有二：(1) 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2) 作为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20世纪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团体、国家，遍布全球。

>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其思想已经影响当代社会理论，其率先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问题。其影响延伸到的影响延伸到主社会科学之外，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媒体、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自然科学（包括了地理和信息科学）、人文学科（艺术、文学、教育）。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承认马克思对于

资本主义分析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对于资本主义最复杂的分析，但是这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分析而已，马克思的概念也隐含了未来世界的想象，启发了许多人对于20世纪世界的社会主义思考，也持续启发了许多21世纪社会主义，例如拉美。

马克思影响的另外一面是其对于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另外世界运动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受到启发的。历史上也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启发的运动，但是不幸的许多这些实验有着威权、压迫、剥削、甚至种族屠杀的下场。马克思主义的实际面向也是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今天，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和越南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去迈向市场资本主义，我们不能否定或是当作这个事实不存在。

然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启发了许多社会运动，把人们团结一起。俄国革命的苏维埃，反殖民运动，古巴和南非的团结解放运动和在安哥拉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都是如此。马克思的遗产都多数代表了这种启发和激发人们去思考 and 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这个世界应该更平等、公平、和平、自由，没有各种形式

>>

的压迫。

今天，后现代的兴起和反马克思主义对于权力、社会异化、危险、不平等、边缘化的概念化已经让马克思主义重新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不仅仅是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若马克思主义要持续，其作品不能被教条性的解读和净化。而政治实践要超出顽斗主义。马克思的遗产持续着，而我是要去不断更新和重塑的才得以可能。就像女性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一样，理论化像是社会再生产，交错性，多重压迫等，我们需要让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当代种族、性别、性倾向、民主解放，生态限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的对话。

► 南非的例子

在南非，一个最大的挑战逝去把马克思带到具有生产性的和种族与种族主义议题的对话中，特别是在种族隔离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对于种族议题缺乏分析的失败是因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去把种族看成社会建构和虚假意识。种族议题不断地在20世纪出现，特别是在大英帝国瓦解，俄国革命，去殖民化，以及抗争种族隔离之后。当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去处理种族，其试图强调种族和阶级的关系，通常把种族简化成阶级，把种族主义简化成资本积累的功能。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种族主义分裂了工人阶级而且需要透过工人阶级的团结政治去挑战之。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普世认同看成比种族的特殊认同还要重要优先。

更复杂的理论分析检视了种族和阶级的交会，透过强调历史的偶然和阐连，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在南非，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种族隔离的国家体系建构出一个种族为基础的政治压迫，并且和资本主义剥削结合，可是，尽管种族隔离结束了，种族压迫仍然持续，资本主义也帮助恶化的种族压迫。为了去了解这

个持续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脉络，以及在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需要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相信已经开始出现。

► 結論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只会继续在21世纪愈益相关，但是前提是我们去足够大胆去辩论、转变、重塑其观点。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已经朝着方向进行了，也把后先锋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反资本主义传统，像是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无政府主义、反种族主义、民主主义、本土主义等结合。这些运动不是去找一个一致的意识形态蓝图或是先锋精英来带领他们，而是共享一个信念，就是“另外的世界是可能的”，透过民主、平等、生态、系统性的另外的世界，并建造给一般人民。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來信寄給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注1: 這些反省來自兩篇文章: Satgar, V. and Williams M. (2017) "Marxism and Class" in Kathleen Korg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M. (2013) "Introduction" in Michelle Williams and Vishwas Satgar (eds.) *Marxisms in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Critique & Struggle*.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 馬克思和全球南方

Raju Das,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 David Fasenfes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ISA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出納(RC02)

马克思是150年前欧洲的人，那是他参与政治和写作的地方。数千页的著作中，只有大概四百页是讨论非欧洲的社会，其中多数是从英国政策的角度去报导关于印度、中国、厄图曼土耳其帝国。若如此，那马克思的作品又如何和全球南方相关呢？全球南方有着世界上多数人口居住，但是也低度发展于欧洲。

若把马克思写作年代或是地理资本发展的问题搁着，我们想要论证一个马克思细致辩证的相关于全球南方的观点。但是，首先，我们要避免两个危险：第一，世界-区域的例外主义（绝对化南方的特殊性），以及欧洲中心的普世主义（机械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把南方看成温暖的欧洲或是“晚到的欧洲”）。我们拒绝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局限于其时空、与南方不相关。这是一个被后殖民和后现代理论家所采取的路径，认为南方非常不同于欧洲。显然，不是马克思写的任何事情都和南方有关，但是很多的确相关。

马克思聚焦在欧洲的分析是把欧洲看成是资本主义系统扎根之处，而非认为欧洲经验就是优越或是特殊的。我们可以安全地说，马克思的作品在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更被拥抱和发展的。

马克思的想法可以被社会关系和地理区域所归类。第一个中，其抽象的观念是关于所有形式的阶级社会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形式的阶级社会，或是先进资本主义下的社会，都相关。第二个归类中，虽然有些看法是针对先进资本主义的19世纪欧洲，但是若论及南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那马克思的作品还是相关的。

马克思观念的整体性反应且试图推动一个激进的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包括改变社会的根深蒂固偏见，歧视女性和弱势种族。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考虑的是经济、国家、文化、生态转型，包括了关于革命性的政治实践观点。

马克思强调生活的物质性，这是和南方有关的，因为南方社会的物质需求通常没有被满足。其辩证的唯物观让我们可以看见南方的物质问题，包括缺少食物、房屋、衣服等，还有各种矛盾，内部对于帝国系统的关系等等。在研究南方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中，以及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取径中，一个对于后殖民观点的批判必须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对马克思而言，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份是有物质需求和文化需要的。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类必须与自然与自己互动。其结合了劳动和生产方式，最终是从自然而来，以及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要去生产以能满足需求。当生产力发展起来，剩余价值出现，可能的阶级不平等和斗争就会出现。在阶级社会，不论南方或北方，自由或不自由工人的大众会从事剩余价值劳动，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說的：

“不论社会的那一个部份拥有了生产工具的掌控权，自由或不自由的工人必须增加其劳动-时间的付出，这对于生产工具的拥有者来说这是为了生产其生活所需，不论这个拥有者是奴隶主，是现代地主化资本家，都是如此”。

虽然马克思的经验例子都是从欧洲来的，其取径基本上市全球且国际的。世界贸易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而马克思指出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形式，成为了全球贸易的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从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开始算起。事实上，世界贸易的地理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然后资本主义成为了全球现象。

南方的国家必须基础地看到阶级的存在，并从马克思的观点去看其社会如何被失败的民主革命、农民革命、民族革命（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所影响，南方的资本主义是深深地被帝国主义影响的，并且和社会形式共存，其包括了封建主义、商品生产，这以关系而非工资劳动所基础。

总之，南方、后苏联社会、新兴市场社会

“我们拒绝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只限于他的年代和
地方。全球南方也有重要影响。”

的马克思观点已经进一步从不同的观点中发展出来。这是和欧洲中心对于社会变迁和抵抗资本主义的看法相反的。事实是存在者各种的马克思主义变形，非洲马克思、亚洲马克思、拉美马克思、印度马克思、中国马克思（中国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主要大学大力推广中），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发展、帝国主义、农业变迁等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这代表了马克思在南方是如此地切身相关。这也指出了南方的期刊把马克思观点的制度化，其讨论也更加和南方息息相关。■

來信寄給 David Fasenfest
<david.fasenfest@wayne.edu>

> 中国的阶级不平等和社会斗争

Jenny Chan, 香港理工大学, ISA劳动运动研究原委员会委员(RC44)



中国的包裹递送工作。Jenny Chan摄影。

在 2017年11月18日的当晚，北京南部郊区的一场大火夺走了19条性命，其中8人是小孩。一栋有地下室的两层楼的建筑被隔间成许多小房间，用便宜的租金出租。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提供紧急救助给那些受难者和生还者，反而驱逐成千上万的“低端”人口，这是官方的歧视用语。这场恶火也带来了整个城市的安全检查措施，并且拆除非法的出租公寓、工厂、仓库、卖场、学校、餐厅、商店等。这侵扰了边缘人口和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个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不是第一次，也不太可能是最后一次，其点燃了公民社会的怒火，但是抗议的声音也很快地被官方媒体消音。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让低收入的人民继续挣扎在“高端”人口的边缘去追求好的工作和居住条件。而中国政府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检视

其对于“中国梦”的修辞和无情的追求如何让人民更加受苦。

> 中国农村移民的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中国快速的资本积累部份是奠基于过去四十年对于农村移入城市的劳动力的依赖。根据官方统计，约2.82亿的农村移工迁徙到城镇的制造、服务、建筑业，从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也增加了5千万人口的迁徙，这是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级的政府也采用了“点数系统”让一些农村移民（特别是那些那大生意人）可以有都市的户口，这是以其是否有能力买房子、是否有特殊工作技能、教育取得等为基准。然而，即使在都市工作好几年后，中度教育者的绝大多数移工和小孩都还是次等

>>



工作的现场。Jenny Chan摄影。

包商在发放薪水之前有必须付出额外成本去负担工人的生活基本需求。这在计划完成时期特别典型。这些失业的人之中，没有土地的移工是最底层的一群。

> 迈向阶级联盟的系统变迁？

自然和劳动都是资本积累的基本：资本积累越快，对于自然的掠夺和劳动的剥削也越大。土地的剥夺和无产阶级化是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资本积累的两大支柱。在地方或低层的政府的护航下，有权的跨国公司利用更过得农业和农村土地还有都市劳动去获利。草根的劳工抗争虽然是地方性的，但也必须同时在所有层次上都要对付全球资本和中国政府。

沿海和内地的短命的抗争是分散和地方性的，这也必须发展到阶级间和内部，并且跨越都市和乡村的分野，建立更广泛基础的社会运动。我作为一个学者和运动者，我必须支持一个更强大的与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联合的联盟，为劳动权益和社会正义奋斗。好的工作环境和居住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奋力争取而来的。■

公民，保有农村居住身份，缺乏公共教育、健保补助、退休金的机会，这都是为了节省劳动成本。

低薪的移工通常住在宿舍，这对雇主来说很划算，确保工人在休息时间可以充分为下一个轮班做好准备。工作和生活的社会空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这是为了透过加班可以让产能达到预期目标。这种多功能合一的工作坊、仓库、居住场所等的混合建筑是早期工业区的典型。而在当今的移工聚集的城市地带也仍然常见。

为了找寻有限了个人自由和私人生活，工人会离开被严格管理的集体宿舍，然后去租可以住得起的公寓。这些公寓通常不贵，没有窗户，或是只有小小的窗户，虽然如此，但至少和外面的世界有连结。有些公寓充满了蚊子、老鼠、蟑螂。水电费和管理费价格差很大。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间租金可是水涨船高，工人的收入几乎被吃掉一大半。

蓝领移民出卖劳动，像是食物递送，包裹递送，叫车，家务清洁工作，这些只是少数例子，这些工作也贡献给了中国的GDP和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数字经济的持续扩张，数千万的新“弹性”工作由于数字平台和套件因此诞生，但是作为独立的契约者，这些人并没有被国家劳动法所保护。其工作的安全性和收入稳定性是很低的。火灾后没有执照的公产和没注册的宿舍的关闭，非正式服务业员工和其小孩，以及其他产业的劳工因此浮上台面。有些人必须花很贵的租金去租暂时的房子，忍受寒冷，有些其他人无从选择，只好离开。

中国内部移工长期以来被都市政府锁定，要“清掉”。从城市到乡村，在“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快速度下，都市对于农地和乡村的侵略更加严重。许多村落被移走，让人无法回到家乡的土地上。没有土地的劳工失去了其原本的村落因此面临了增加的负担：雇主并不愿意雇用失去土地的乡下人，因为这会让成本升高。农村计划的承包商，特别是在建筑业，其都会拒绝雇用没有土地房屋的农民工，因为承

來信寄給 Jenny Chan
<jenny.wl.chan@polyu.edu.hk>

> 印度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比较

Niharika Jaiswal, New Delhi, 印度



50

大学的市场化伤害了印度和全球的大学。

在印度，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到来，加上知识经济的成长，私有教育机构，全球网络，私部门的成长等，导致了一种判断何谓“相关知识”的判准。教育作为“公共财”已经被“私有商品”的概念所取代。大学变成“品牌”，贩卖“有市场价值的课程”。这样的论述结构把博雅教育当作是“没生产力”的，让像是社会学的学科要重新创造自己才得以生存。

虽然这个迈向市场化的过程已经不是新闻

了，但是对于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市场化过程却所知甚少。这个市场化的汇聚挑战了在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民主社会脉络中的“公共”的意义。我的论证是透对于印度的两所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比较而来，我比较大学的社会学课程，这些大学分别是公立的 Delhi University (DU) 和 Ambedkar University (AUD) 以及私立的 Shiv Nadar University (SNU)，位於 Delhi。

DU 在 1922 年成立，重点是，从 2012 年开

>>

始，该校就不断地更新其课程规划，从学年制换成学期制，从四年制 (FYUP) 换成 2015 年的选择学分制 (CBCS)。AUD 是的州立大学，创立于 2010 年，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而 SNU 则是 2011 年开始运作。我透过三个大学的不同成立时间点、不同课程规划去比较，而其实做是类似的。

第一，所有三间大学都发展了一个整合的课程，并以“创新”，“选择”，以及更好的就业机会为价值诉求。在 FYUP 和 CBCS 里，增加的选择是以“选择性”的形式出现，提供受欢迎的课程，像是发展，媒体，环境，视觉文化，等等。“应用课程”，Delhi University 的 FYUP 架构或是 CBCS 架构的“增进技能和技术的课程”，或是 AUD 和 SNU 的选择一个主修搭配一个副修，这些都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技术。

第二，当代课程的相关像和跨学科性被强调了。在 Delhi University 的 FYUP 架构或是 CBCS 架构，以及 AUD 的社會學，跨學科性是透過選擇其他系的課程而被實踐的。

例如，AUD 的“性别与社会”的课程读物中 30/35 项是 1990 年之后发表的，因此其试图去引进新的主题，知识来源，以及跨学科性，目的去增加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技巧。

第三，大学和业界的连结越来越强。在 CBCS，学分系统标准化了员工的平来。像是 AUD 的“组织暴露”或是“表达工作坊”，以及 SNU 的“研究，體驗，應用學習”，這都讓學生參與了各種的 NGO，研究組織。此外，強調大學生閱讀民族誌，實質研究，寫論文，以及對於社會學理論的失去興趣等，這都鼓勵了應用研究而肥學術研究。

和 SNU 和 Yale、Sciences Po、Stanford、Berkeley 等等，目的是刷亮学生的履历。

因此，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被包裹成一个跨学科、当代、整合的学科，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全球能动性。但是，社会科学的本质：批判性和创意，被妥协了。

这个在 DU，AUD，SNU 之間的相似性是他們都回應了知識生產的新自由主義典範。這個改變影響了公立大學的教色和位置，因為公共制度有責任去將教育視為增進社會福祉。但是越來越多對於可以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大學的建立讓這點受到了弱化。市場驅動的教育可以視為公共財嗎？我們認為受教育者是學習者或是消費者？

重要的议题是哲学的对于“公共”的重新概念化被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框架所压制住了。这个关于公共大学的角色的辩论不是根植于所

有权的改变。反之，这是从公共领域、空间、价值、动机的意义改变而来的。公共领域的独特是其成员之间的平等，论述的批判性，还有各种意见的包容，以及宪法权利与公民身份的法律连结。因此，社会福利国家确保了教育、水、道路、就业等的可取得性，公共制度也保护了公共生活。

在新的概念化中，诉诸在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差异整合然后开创一个“全球大学”让平等、批判思考、可取得性等价值消失了，这是民族和民主的历史轨迹所共同建构出的价值。采用市场的学术管理架构让印度的公共领域架空了。结论是，虽然大学在全球的竞争上或许成功了，或许被认为有全球化的高质量教育，对于特出权力政治的忽视，使得公共空虛化，去民主内含，这将会导致公立大学的消失。

來信寄給 Niharika Jaiswal
<niharika.27.j@gmail.com>

> 《全球对话》 的變與不變

从 这期开始，《全球对话》的主編有所改變了。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接下了 Michael Burawoy 的职务。Michael 创造了這個環境，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編輯翻譯，是一個擁有學術和非學術的觀眾的社會學雜誌。我們加入這個大家庭是緊張又興奮。《全球对话》有變，也有不變。

Brigitte Aulenbacher 是奧地利 Linz 的 Johannes Kepler 大學的社會理論和分析系的系主任以及社會學教授，還有 ISA 的 2016 年 Vienna 的第三屆論壇的在地籌備委員會委員。其研究包括了社會學理論，性別，交織性研究，工作和照顧社會學，目前研究 24 小時的照顧工作和大學的市場化。Klaus Dörre 是的 Jena 的 Friedrich Schiller 大學的勞動、工業、經濟社會學系的主任，

其領域包括了資本主義理論，金融資本主義，彈性和臨時雇傭，勞動關係，策略工會主義。他是德國研究基金會所資助的後成長社會研究小組的執行長（与 Hartmut Rosa）。

新的主編們也有一位得力的副主編幫忙：Aparna Sundar，還有兩位助手：Johanna Grubner 和 Christine Schickert。Aparna Sundar 從加拿大 Toronto 拿到政治學博士，之前在 Toronto 的 Ryerson 大學擔任助教授直到 2016 年，然后在印度 Bangalore 的 Azim Premji 大學擔任副教授。Johanna Grubner 有社會學碩士學位，是奧地利 Linz 的 Johannes Kepler 大學的研究員，領域是女性主義理論和性別研究，著重在身體和質化方法。其博士論文聚焦在大學中的性別平等。Christine Schickert 有美國研究的碩士學位，社會學副修，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Christine Schickert.



Johanna Grubner.



| Aparna Sundar.



| Lola Busuttil.



| August Bagà (aka Arbu).

GLOBAL
DIALOGUE



德國的 Jena 的 Friedrich Schiller 大學的社會系中的後成長社會研究小組擔任管理組長。

很幸运的，《全球对话》有長期的合作夥伴，在西班牙的 Barcelona 作為根據地，有 Lola Busuttil 和 August Bagà (Arbu) 继续为执行编辑，而区域编辑的工作团队也将继续。Lola 和 Arbu 從最一開始 2010 年就和 Michael 合作，Lola 是專業的編輯和翻譯，負責每一期的品質控管，Arbu 则是专业的美编，负责《全球对话》的版面設計。

当所有的区域编辑继续的时候，Michael 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咨询者，保证这个转型交接的顺利进行。最后，我们也会和 ISA 的出版委员会继续合作，并且也和执行委员会作为顾问一起合作，还有执行秘书 Izabela Barlinska 以及

在 Madrid 的團隊，沒有他們，《全球对话》是不可能的。

整个团队有七人，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加上区域的编辑，有学生，有年轻学者，也有资深学者，来自超过十七个国家，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全球对话》因此可以呈現多元的聲音，多元的社會學，還有多元的在地觀點。這提供了一個具有建設性的對話和辯論場域，也提供了一個讓年輕與資深學者發聲的平台。這是一個全球的網路，上面討論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議題。

做为一个团队，我们期待与你们联络，创造一个共同的全球对话。■